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12 期 2011 年 12 月 10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  
北大荒苦役一天丧七命

——中央国家机关流放“右派”的惨痛一页（倪艮山） .....2

走出炼狱（陈懋谱） .....4

八十年一梦（白桦） .....19

剧坛女杰徐九虎——对母亲一生的追忆（叶巧明） .....22

我不再上访了（雷润泽） .....31

旁观者聊教育（老赵） .....35

除了“走资派”，什么“帽子”都戴过（它 山） .....38

北大形象（杜 光） .....41

一九五七年的“在劫难逃”（郭罗基） .....42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

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决定 43

来函照登 .....48  
~~~~~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bsyy1957@yahoo.cn

北大荒苦役一天丧七命

——中央国家机关流放“右派”的惨痛一页

倪艮山

我流放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夏天，所在的八五〇农场分场——云山畜牧场，开始控制、按人分配口粮。原来稀粥烂饭还能对付吃饱，饭食突然限量，又没啥菜，还得干重活，倍感饿得慌。队指导员欺哄我们说：因为进入雨季，道路不好，粮食运不进来，这是暂时情况。

大家盼过了雨季，情况并未好转，而是口粮越来越紧缩，最后把口粮压缩到每人每天毛粮七两，折合成成品粮尚不足五两。一日三餐，每顿饭平均不到二两。对此，队里再也无可解释了。

到1960年秋，我们挨饿已一年多了，加以苦活累活从不间断。除了大田农活，如整地、播种、锄草、间苗、秋收、脱谷等以外，夏季要冒酷暑打草、积肥、割条子（荆榛等幼树）、修建房舍、脱坯等等；冬天顶着零下四十度严寒，刨冻土修水渠、进完达山伐木、放树烧炭等等。饥饿、劳累使我们的身体日趋衰垮。浮肿病如同瘟疫似地扩散开来。身体基础好的，尚可勉强支撑；身体基础差的，走路都打晃了。大家意识到，生命的火焰快要熄灭了。有人在路上瞥见牲口啃过的萝卜头，迅即捡起来送到嘴里。有一次伙房拉来一车作马料的小干玉米棒，每个长约二、三寸，用大锅煮熟了，让大家放量吃。我狼吞虎咽地撑饱了。不久腹痛难忍，把吃的玉米全吐了出来，病了一天。另一次，队里熬了一大锅“小米南瓜粥”，米汤里没有多少米粒和南瓜，让大家放量喝。我喝了好几大碗。喝完后觉得胃腹胀满，如同腆着大水袋，难以活动。只好就势躺在山坡上，静待米汤向下走动。那时人们都愿意安排给伙房挑水，炊事员能赏点饭锅巴或做豆腐的豆巴，如获至宝，聊以充饥。个人外援基本上断绝。有位伙伴家里邮来一盒糕点，他到邮局领取时，只得到六块小木板和一个包裹皮。邮局人员告知，盒内东西中途被“鼠”吃掉了。他还得照章办了签收手续。真是有苦说不出。

忍饥挨饿的艰苦生活，沉重劳动，农场头目的冷漠歧视和威胁训斥，使我们这批流放知识分子的身体日趋衰垮，精神濒于崩溃（如一机部子弟学校校长佟蔼成上吊自杀；轻工部曹作仁投井身亡等等）。农场头目对我们这些“老右”们毫无恻隐怜惜之心，逼压日甚。时常传闻有人在饥饿劳累中被折磨致死的信息（如侨委的张建淼、交通部的屠双、总参的杨泰泉等等）。

我们为了解决饥饿，寻找一切可能机会而绞尽脑汁：挖野菜，采食野生植物；收割庄稼时，偷摘生吃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侥幸碰上萝卜地，悄悄拔出萝卜，撸一下泥土，便大口吃起来。靠这些机遇，使濒临死亡的人们得以苟延残喘，暂缓沦为饿殍。但是这只能济一时之急，而不能根本挽救垂危的厄运。后来终于发生了大死亡的恐怖骇人悲剧。

1960年10月13日，一个不祥的日子。我们奉命到小云山四队的七虎山搞大会战，冒雨突击抢收黄豆。因为路远，凌晨三点起床。每人吃只有鸡蛋大的两个黑馍，一碗空汤。另发两个黑馍作为午餐，由个人自带。匆匆饭罢，凄厉哨声急催出工。队部有人带路，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进。

北大荒的十月，秋寒已浓。当年雨水多，有些秋涝。一路上多是烂泥塘。脚踩下去，烂泥深及小腿。有人鞋带没系紧，往往把鞋掉在烂泥塘，很难拽出来。泥泞之路漫长。大家走得已感精疲力竭了，才陆续到达豆田。因为天还没亮，看不清庄稼，暂坐地头待命。秋风吹来，瑟瑟发抖。天色朦胧，队部命令下田开镰。每人包两条垌。众人一字排开，摸索前进。杂草丛生，深可没膝。豆棵稀少并矮于杂草。垌与垌分界模糊不清。割豆子时，只能在草丛中搜索。

开镰不久，阴沉的天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我们顶着秋雨，穿行在湿漉漉的荒原草丛中，衣服都湿透了。手抓洒满雨水的豆秸，感觉凉彻心骨。手指麻木。田垅漫长，一眼望不到头。我们在秋风秋雨中艰苦地搜索前进着，仿佛心在一步步的下沉。

大家前后错落拉开很远。干了不知多久，队部传下来命令，可以吃午饭了。饭后就地休息片刻，然后继续干活。

每人携带的两个黑馍，几口便吃下去了。处处泥泞、积水和淋湿的荒草，使大家只能站着休息。小雨时疏时密地下个不停，有人穿的棉袄都湿透了，从里往外凉。为了干完两条垅，大家很快又搜索前进。天色渐渐暗下来，估计时近黄昏。阴沉的天空依然飘洒着零星的雨丝。田垅已可望到尽头。这时队部下令收工。大家聚拢集合，准备撤出豆田。田边到泥泞归途之间，横亘一片水塘，约有二三十米宽。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塘涉水。水深没膝，有的地方可与腰齐。有几位体力不支的，由同伴搀扶，或两人架一人，拼力地向路边挣扎。

大部分人上了路，有少数人还在趟水。这时已经暮色苍茫了。教导员李惠和几个队部人员提盏马灯为前导，在烂泥道路上开始踏上归程。后边的人越拉越远，首尾逐渐不能相顾。

后边的人很焦急，用凄凉的声音呼喊：“前边等等我们吧！”“发扬革命人道主义，别把我们丢掉了！”“救救我们吧！……”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微弱了。其中古籍出版社侯德麟的清亮嗓音，听来格外显得凄凉。教导员等停下来，高举马灯，大声训斥说：“你们快点跟上来，不要磨蹭！”说完又继续向前赶路。这样前后呼应几次，最后一切声音都在沉沉夜色中消失了。一种莫名的恐怖感不由地袭上心头。

我意识到，这里环境陌生，夜色漆黑，在荒野的烂泥道路上，如果落后掉队，会迷路、遇险和死亡。虽然筋疲力尽，周身疼痛，瑟瑟发抖，也只有咬紧牙关，拼尽余力，不让那盏马灯昏暗微弱的光点从视野中消失。

这时忽见前面路边有个黑影坐着不动，我警惕地走近一看，竟是国家经委的马镜亮。他是和我同车流放北大荒的，互相熟悉。我问他：“老马，怎么了？能走动吗？要我扶你吗？”他说：“没事，我休息一会儿，你先走吧！”我了解他以前体力好，干活总打头，于是放心地说：“那我先走了，你也尽快回队部吧！”这位抗美援朝回国的志愿军人，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对单位人浮于事、功效不高，仅提一句“鸡多不下蛋”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我没想到，他那生命的旺盛火花已耗到尽头，再也没能走回队部，和我说的两句话竟成了诀别。

后来了解，在归途中远远落在后面的一大批人中，有两人在水塘附近便倒下去了。有几个人靠伙伴架着勉强支撑往回走，已经说不出话了。大家在路边一片树林里停下来，安排重病号靠树坐下。找来一些杂草和树枝，拢起一堆篝火。烘烤一些时候，病号情况并未好转。从跳动的火光中，看到病号瘦骨嶙峋的苍白脸孔，让人揪心。淋湿的衣服升腾着缕缕热气。这时先回队部的伙伴们，送来热汤和馍，设法喂给病号，但是他们已经张不开嘴，不能进食了。他们眼看着嘴边梦寐以求的食物，悲愤地离开了苦苦挣扎将近三年的这片黑土荒原。伙伴们把这几个病号连同马镜亮等抬回队部，安放在食堂地上。以手测试，尚有微弱鼻息，胸口犹有余温。找到四队卫生员来抢救，他只看了看便冷漠地说：“没救了！”话音刚落，人已扬长而去。用电话向分场场部呼救，只得到冷冰冰的回答：“明天再说！”抢救人是刻不容缓的事，怎能等待明天呢！在当权者心目中，右派分子人命卑微，形同草芥。

这一夜，包括水塘附近倒下的商业部教员孔宪中、轻工业部设计局的杨隼两人，共有七位伙伴，带着深沉的憾恨，撒手尘寰，把历尽磨难的遗体，长埋在七虎山下的黑土坟丘里。现在尚能回忆起来的，除国家经委的马镜亮外，还有一机部归国华侨、业余作家刘湖琛；军事测绘学院讲师唐奕华；人

民银行总行干部陈伯龙、教员徐征明等。刘湖琛自来到北大荒后，每晚坚持写日记。熄灯后，他用自备手电微光照明来写。积累了许多素材，未及整理成书，人已撒手尘寰，魂断七虎山。他的爱人已被逐出北京，下放在吉林白城子。可怜山下田边骨，犹是贤妻梦里人！文章未竟身先死，常使亲朋泪满襟！

三年来，流放到北大荒的中央机关知识分子精英，陆续发生公亡、病歿、自杀、失踪等情况，大家已司空见惯了。但在一夜间突然死亡七个人，尚属首次。虽然农场极力淡化和低调处理，但在流放知识分子的心灵上，仍然掀起强烈震撼。我们不能不思索，流放知识分子的生命已贱如草芥蝼蚁。这七位本不应早逝但却遽然死去的人，不正昭示着尚存者明天的命运吗！？这条改造的必由之路，要把知识分子推向何方？面对即将降临的第三个严酷的冬天，想到风雪弥漫的茫茫征途，真令人不寒而栗。

2011, 11, 03 修订

作者简介：倪艮山，蒙古族，辽宁省新宾县人，194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在东北计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等单位从事计划工作。高级经济师。1987年于地质矿产经济研究院离休。曾任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大专班学员毕业论文导师，《世界有色金属》特邀通讯员。改革开放后曾在报刊发表专业译著文章百万余字，在书刊和网络发表一些文艺作品与时政评论论文，著有《沉思集》、译著有《矿产经济学》（印度出版）等。通讯处：北京259信箱双休处

走出炼狱

陈懋谱

释迦牟尼说：“心可以为地狱，亦可以为天堂。”

当一个人身处地狱时，最可怕的是心也成了地狱。

其实，天堂并不渺茫，就在你心灵深处。

——题记



正是莺飞草长、布谷催耕的季节。

早晨，生产队长派我去耙栽秧田，限我要在上午耙好一块两亩左右的水田，说是下午要插秧。我不敢怠慢，草草吃了几口饭就赶着牛，扛上铁耙，挽起裤脚，跳下水田忙碌起来。耙栽秧田是水稻种植过程中一项很费力的细活，要耙好一块栽秧田起码要横一遍竖一遍耙上六遍，才能达到土平泥绒的要求。一个上午要耙好两亩田已经超出正常工作量的一倍。牛喘着粗气，在我的吆喝鞭打下不停蹄地赶超时间。

（左图：作者陈懋谱）

太阳当顶的时候已耙完四遍，我正奋力压住耙杆，鞭牛把一堆高出水面的泥土往低处推，因推泥太多，纤绳不堪重负，“嘣”的一声断了。我去结断了的纤绳，老牛也许是要发泄对我的愤怒，尾巴一甩，正打在我的脸上，甩了我一脸一身的泥浆，我气急败坏地对牛大骂起来。这时，突然听见身后田埂上一个女人的声音：“老陈……老陈……”我的名字前面从来没被人加上“老”字，所以不知她在叫谁，没有理会，仍埋头结绳。

“陈懋谱……同志……”

听得出，“同志”一词是迟疑一下才补上去的。回头一看，原来是公社妇女主任、驻村干部在叫我。我好生纳闷：这么多年，无论是男女老少，非和我说话不可时，都是直呼其名，今天为何一个公

社干部呼我名字后破天荒地加了一个“同志”，而且那语气已没有往日盛气凌人的严厉和鄙夷？边纳闷边听她继续说：“你马上把牛下了，到生产队保管室（平时集会的场所）开社员大会。”我更吃惊了，这些年，只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训话会才叫我参加，这社员大会的神圣殿堂，我还从来没有享受过登堂入室的殊荣。惊疑之余，预感到我的命运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这变化也许就从这声“同志”开始。

匆匆下了牛，连鞋也来不及穿，赶到保管室，室内已坐满了社员。蹑脚跨进门槛，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惴惴坐下。公社妇女主任宣布社员大会开始，接着郑重宣布：“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公社党委决定，摘掉陈懋谱右派分子帽子。”听见“摘掉”二字，我如逢大赦，心跳不已，赶忙站起来向社员们弯腰点头，感激涕零。为了这两个字，我用血泪青春奋斗了整整20年，它标志着长达五分之一世纪的人生炼狱的结束，宣告我生命历程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不容于世的孤魂野鬼终于获得一张重返人间的门票。伸出双手，分明已触摸到还略带冬日余寒的料峭春天。

当天下午，遵照公社的嘱咐，我背上行囊，身穿破衣，脚着草屨，满身泥浆，风尘仆仆赶往区公所知青办报到——他们要我去辅导全区知青参加当年高考。

从此，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十五年，洒下血汗，交织爱恨，苦我养我，患难与共的川北小山村，沿着崎岖的小道走向人生下一段漫漫旅程。

这天是：1978年5月5日，距彻底改变我命运的那个“不平凡的春天”刚好21周年。

写了张“犯上”的大字报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充满生机与活力。宽松的政治环境，浓郁的治学氛围，丰厚的学术蕴藉，蓬勃的求学热情，构成了大学独特的人文景观，为莘莘学子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奋力攀登在知识的崇山峻岭：或据案苦读，或挥毫笔耕；饮智慧之琼浆，餐文华之芳蕊；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生活丰富而多采，思想浪漫而充实；不知什么是忧愁，不知什么是烦恼；乐呵呵铺筑着五彩路，美滋滋编织着成才梦。天上明霞似锦，心中好歌如潮。我们是新中国最幸福、最自豪的第一代大学生！

好日子在弹指一挥间匆匆而过，转眼到了1957年。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劫难年。几十万无辜的读书人在一场政治运动中遭遇灭顶之灾，一下子从天堂坠入地狱，用他们脆弱的生命和惨烈的经历为历史留下了一曲曲旷世悲歌。

这年春天，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毛泽东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号召人们“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把皇帝拉下马’”，鼓励民主人士大胆地“放”。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接着在13日、17日、26日又连续发表号召“鸣放”的社论。在全国上下一片“放”的鼓噪声中，在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下，“大鸣大放”很快在全国卷起狂澜。只要翻开那时的报纸，每天大部分版面都是“鸣放”消息和著名人士的“鸣放”言论。

四川大学作为巴蜀名校，是高级知识分子、人才精英的荟萃之地，理所当然成了“大鸣大放”的热土。运动开始只在教师中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局面显得有些冷清。

一天傍晚，图书馆门前贴出一张题为《清华来信》的大字报，内容是介绍清华的“鸣放”情况。这是川大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在全校引起强烈震撼，出于好奇，观者如堵，天黑后还有不少人秉烛夜读。这把火立即在川大熊熊燃烧起来。第二天，学生开始贴出大字报，很快把图书馆外墙贴得密密匝匝。学校为保证张贴大字报的场所，又在校园中心荷花池周围临时搭建了木栅栏，供师生张贴大字报，很快又被张贴一空。整个校园成了大字报的海洋。

这时我正担任川大学生会宣传部长，当然不可能置身“鸣放”之外，像参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政治热情又一次高涨起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运动，5月的一天，校党委宣传部召集团委会、学生会

干部开会，要求我们负责组织学生中的“鸣放”。会后，我们从各系团总支、学生会到各班级，层层进行动员，大字报、油印报、板报、自由论坛等各种“鸣放”形式大量涌现，全校师生都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政治漩涡。

正是“鸣放”高潮之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来川大看大字报，了解“鸣放”情况，我是陪同参观的学生会干部。结束时，他把我们带到校党委办公室，对川大的“鸣放”作了指示。他说，川大的“鸣放”已发动起来，形势很好，但只是涉及了党政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还“鸣放”不够，应继续深入“鸣放”。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再一次进行发动，要求各系对重大政策问题提出批评建议。于是很快掀起第二波“鸣放”高潮。我为了带头，也借用冯梦龙“三言”的书名为标题写了《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等大字报。其实，我这些大字报也并未涉及什么重大政策问题，因为我对当时党的方针政策根本就没有反感，只是对一些看不顺眼的时风世象发了些牢骚，作了些讽刺，语言不免尖刻，背后还有一种出出风头的顽童心理。

5月下旬，省委宣传部长再一次来川大看大字报，我又是陪同者之一。他边看边说，川大的“鸣放”在方向上有问题，应引起警惕。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他说这话的背景是党中央对“鸣放”已改变初衷，正准备开展反击，幼稚地认为他的谈话与党中央的“鸣放”政策相抵牾，和他上次来参观时的谈话也自相矛盾。于是毫无顾忌地写了一张犯上的大字报《质问×部长》。这一无知之举铸成终身大错，成了我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铁证。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改过去鼓吹“鸣放”的调子，发出了反右派的强烈信号，全国政治形势风云突变，“鸣放”偃旗息鼓，反右派的呐喊响彻全国。川大的反右派，开始只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全国知名人士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以及校内最典型的人物——写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生物系女生冯元春，还没有点名给谁戴右派帽子。当时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又积极响应号召，像当初响应号召投入“鸣放”那样，参加到反右派的斗争中去，大会小会踊跃发言批判章、罗等的所谓右派言论。放暑假前反右派暂告段落，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约我写了篇谈反右派体会的文章，8月10日在川台广播。

我轻轻掸掉几个月来的政治风尘，无忧无虑回到乡间消夏，尽情享受故乡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打入另类

暑假结束返校，第一件事就是校党委召开全校学生干部大会，党委书记丁耿林动员部署全校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会议结束不久，团支部书记通知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待“鸣放”中的言论。我感到很突然，“难道自己有什么问题？”组织安排，不便多问，不能不写。我如实写了自己在“大鸣大放”中所做的工作。刚过两天，中午下课回宿舍，抬头看见宿舍大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川大学生会要把我们引向何方？》，点了三个学生会干部的名，我的名字也赫然在目。这时我如五雷轰顶，耳聩目眩，眼前一片黑暗。凭直觉，我意识到这张大字报绝不是个人感情冲动所为，背后一定站着威严的组织。我断定自己已被毛泽东所说的这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的运动所套牢。不出所料，年级立即展开了对我的批判，不久又在全系进行批判。不容声辩，无须法律，不经审判，一顶象征褫夺公民权利，毁灭人格尊严的右派分子帽子稳稳当当戴在了头上。

这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悄悄跑到锦江堤上独自徘徊，静静地回想这几个月我所做的一切。组织学生“鸣放”是校党委交给的任务，对所谓重大政策问题深入“鸣放”是省委宣传部长的指示，错了吗？自己写的几张大字报没有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内容，是右派言论吗？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反复号召群众对党内的“三个主义”提出批评，我只不过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做了一些党委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应该看作是对党忠诚的表现，为什么反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说，是党把自己从一个只读了初中一学期的贫苦孩子培养成国家干部，又送我上了大学，共产党是自己的恩人，无论怎样深挖索隐，上纲上线，我也挖不出反党的思想和感情。越想越觉得委屈，越想越觉得冤枉，而这

种委屈又无处可诉，组织已把自己当成敌人，好友也弃我而去。眼前，看不到一线光明，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这时，我想到了死，以死申冤，以死明志。

夜，已很深了，四周一片寂静。我沿着望江公园门前的码头台阶（那时这里有渡船），下意识地一步一步走向河边，快触到河水时，突然对岸一道强光射向水面，同时传来刺耳的喇叭声，一辆汽车疾驶而过。我仿佛从梦中惊醒，怔怔站住，责问自己：你在干什么？这时我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荒唐：这段河面我们常来游泳，深不及颈，淹得死么？死神与我擦肩而过，一道亮光，一声笛鸣，助我摆脱了第一次精神危机。

此后，我开始过一种无囚徒之名有囚徒之实的畸形生活。说是囚徒，没有把你关起来，也没有刑期，在校内有行走自由，也还可以听课。说不是囚徒，很多活动你不能参加，很多会议你无权涉足；出校要向专门管右派的人请假，返校要销假，要定期写思想检查，定期接受评审，国庆等重大节日不准外出，没有休假权，只能在校内参加劳动。除了右派之间可以讲话，没有人主动和你说话。你是魔鬼，你是瘟神。

人是群体性动物，需要交往是人的天性，任何人也难以禁止。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可以划一道政治鸿沟加阻隔，但右派之间的交往却无法切断。学校打出那么多右派，又经常组织在一起劳动，有段时间甚至把右派从集体宿舍赶出来，让我们单独住在一起。这样，无形中就形成一个另类社圈，无论本系外系，教师学生，只要是右派，彼此很快就熟悉起来。如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川大副校长谢文炳教授，校党委委员、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倪受僖教授，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等，我就是在和他们一起劳动中加深了解的。这个圈子成了右派们在严密天网下唯一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群体相伴，我真会窒息而死。

反右派以后，学校里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和奇奇怪怪的体力劳动突然多了起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1958年初在学生中开展所谓“红专”辩论，批判“白专”道路、个人主义，人人检查，个个过关，自我批判，互相开火。很多同学躲过了反右派那一关，却无法逃过这一关。受批判者虽然不戴帽子，但左中右已阵线分明，为日后毕业分配乃至分配后的工作走向都埋下了伏笔，定下了调子，留下终身印记。接着又是所谓教育改革，名为改革教育，实则把矛头指向广大教师，掀起什么“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发动学生斗教师，不少著名教授、专家、学者被扣上“资产阶级教授、专家”或“冒牌”学者的帽子，受到无情打击。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反右派的延续，是对广大教师、学生进行大规模整肃。右派分子罪不容诛，广大师生也不可信赖，当然也逃不脱挨整的厄运。

反右派斗争及这些后续运动，其理论、政策、做法，成为后来“文革”的肇端，而“文革”则把这些理论、政策、做法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发展成贻祸全国戕贼万民的大灾难。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大学校园也如火如荼。为了农业生产放卫星，不务农的大学校园掀起了挖花园、垦农田的浪潮。优美如画的校园转瞬变得遍体鳞伤，满目疮痍。操场变成了麦田，菜花代替了鲜花，农田搬进了城市，学校放出了卫星。有了农业丰收，没有工业硕果，哪像大学。于是校园内处处垒起了土高炉，没有原料用废铁，没有燃料用木柴，没有鼓风机用风箱，学生分成三班倒，24小时不停火，炼出了一堆堆废铁渣。就是这些铁渣凑够了当年超英赶美的钢铁指标。

那年头，人遭磨难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可悲的是连麻雀也难逃劫数。不知根据什么标准，经什么人批准，麻雀被列入了“四害”名单，要斩尽杀绝，一个不留。一声令下，全国立即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麻雀歼灭战。领导动员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任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规定在同一时间全国总动员与麻雀开战。据说最有效的杀灭法是驱使麻雀不停地在天上飞，直到精疲力尽坠地而死。于是，学生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手执长竿，放声吆喝。麻雀们惊恐万状，满天乱飞，稍有敛翅，吼声又起。麻雀在天上飞呀飞，人们在地上吼呀吼，就是不见麻雀从天上掉下来。这场人与麻雀之间的吉诃德式大战，延续了几夭，不得不草草收兵。

以上这些活动，有的禁止我们参加，如“红专”辩论、教育改革等，有的强迫我们参加，如毁操

场种地、大炼钢铁、赶麻雀等体力劳动。不能参加的活动给我留下了大量时间，必须参加的活动，早晚也有大量时间，何况后两年基本没有上课，时间成了我最大的财富，应该好好珍惜充分利用。虽然我被剥夺了公民应该享受的种种自由，却剥夺不了我思考和读书的自由。图书馆大门还向我敞开着，也未规定不准借书给右派。我就钻了这个空子，一头扎进书海，超脱尘嚣，与古今中外的智者们倾心交谈，用智慧之泉去浇灌干涸荒芜的心田。打成右派后的两年，读书总量大大超过前两年，不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还系统读了西方哲学名著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记了一本又一本读书笔记。读书不仅减轻了心灵的痛苦，充实了空虚的生活，也使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对世界对人生都有了崭新的理念，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不再自暴自弃，不再悲观惶惑，无论前路多么艰险，无论命运多么坎坷，我都会挺起胸膛坦然面对。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度过此后长达 20 年的悲怆岁月，战胜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全靠这两年读书生活构建起的精神支柱。

1959 年秋，四年大学生活结束。没有毕业证，没有纪念章，没有毕业合影，没有同学聚会，没有临别赠言……同学们有的我都无权拥有，属于我的只有那顶为我带来九九八十一难的右派分子紧箍帽。怆然离开母校，登上北去的列车，新疆茫茫大漠，又将增添一名年轻的流放者。

流放中“恶习”难改

车过秦岭，窗外青山渐渐隐退，进入八百里秦川。川内阡陌交通，良田纵横，林盘村落，点缀其间，与蜀地无异。视线远移，景色大变，近丘远山，黄土裸露，看不见一点绿色，也难见些许人迹，仿佛另一世界。这时，我心里一沉，怅然涌出异乡漂泊之感。生我养我的天府之国离我越来越远，故乡亲人只能梦中相见，漫长的天涯苦旅，在车轮的咣当声中一步一步展开。

第三天凌晨，车抵尾亚，这里是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又是兰新铁路已通车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在这里改乘汽车进疆。初秋时节，成都尚穿单衣，这里已寒气逼人。走出车厢，眼前尽是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是从内地到新疆找饭吃的，通称“盲流”人员（即没有正当外出手续，又无明确去向，盲目流动的人）。招工单位多，是新疆建设兵团的农场，不下二三十家，招工人员站在各自的汽车上高声叫喊：“找工作的人快到这里来报名，有无手续都收，马上就开车了。”那架势很像自由市场高声叫卖的商贩。“盲流”们纷纷涌向各招工点，挤满一车就拉走，第二辆车又接着叫喊。看着这景象，我不禁想起美国百多年前大批民众涌向西部淘金的情景，想想自己的处境不也和这些“盲流”大军不相上下吗？不知等待他们和我的命运是吉是凶，是喜是忧。

那时客车很少，我和赴疆的川大同学挤上一辆货车向乌鲁木齐进发。汽车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奔驰，车后扬起阵阵黄尘，像喷气式飞机掠过天空留下长长的气浪，始终尾随其后，不会消散。黄沙、砾石构成的地表，就是我想象中的戈壁。戈壁上不长树，偶而可见一丛丛黄褐色的野草，后来知道那是极耐干旱的芨芨草，很像我的生命。

颠簸两天，抵达乌鲁木齐，住在自治区政府招待所等待分配。其他同学很快落实了单位，剩下我们四个右派苦熬。过了一个星期，叫我们到教育厅报到，厅里安排我们做整理陈年档案的工作。冬天到了，我们四人仍住在一间原来无人居住的破屋里。室外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气温经常在零下二三十度。普通居室不是暖气，就是热炕，我等居室取暖设备概无，宛如一座冰窟。为了不致冻死，我们只得两人挤在一床，拥脚而卧，以体温互暖，熬过长夜。当时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记得有两句是“粥薄愁昼永，衾寒盼晨鸡”，这是当时落魄境况的真实写照。

这年冬天，乌鲁木齐正在修一大型水渠，各单位都要轮流抽调干部去工地劳动，我们四人当然成了教育厅的常任劳动代表，无须轮换。工地距城有七八里地，每日徒步早出晚归。老天像有意为难我们这些刚到新疆的四川人，每日大雪不断，地面冻土如铁，十字锹挖下去，只现一个白点。不多久，手掌就震出血口，脸上也冻得麻木。别人都皮衣皮帽，毛靴毡筒，全副武装，我们每人每月只有 35 元生活费，无力购置御寒皮装，穿着四川带去的棉衣绒裤，立于冰天雪地之中，不得不拼命劳作来调

动体内热能，以抗御酷寒。为此我们每天至少要比别人多干一倍的活。这样接连干了三个月，春节来临，工地停工，我们才算上完来新疆的第一课，初步品尝了人世的艰辛，也为适应新疆的冰雪生活奠定了基础。

1960年春节过后给我们正式分配工作。其他三人分别去了南疆的库尔勒、喀什、和田，我算幸运留在了教育厅筹办新疆教育行政干部学校。5月，自治区各厅局为了缓解蔬菜供应困难，改善职工生活，纷纷办起了农场。教育厅也在米泉县高家湖（其实这里没有湖）办起了自己的农场，干部轮流下去劳动，一月一换。以我的身份，自然又成了干校驻农场无须轮换的常任代表。在农场劳动虽然比机关辛苦，但可以吃饱肚子，还可以在农民那里买到鸡蛋，又少了许多精神上的羁绊，可以不受拘束地唱歌、拉琴，可以和教育系统的右派分子相识相知相乐，生活不仅不觉得寂寞，甚至有点浪漫而富有诗情画意。

大概因为我是农场的常驻人员，又大概农场领导是个政治立场不那么鲜明的“糊涂人”，他见我劳动诚实，又没有轮换机会，不应该长期干重活，不久就给我派了再美不过的轻松差事——看守瓜园。这活只需日夜守在瓜棚里，看住牲畜不要撞进瓜园，至于贼那是无须防的，因为瓜园远离村落，平时是没有人去的，即便有人去了，那也是难得的稀客，可以有人说话，不再是哑巴。管他相识不相识，挑最大最甜的瓜请他吃，边吃边天南海北地瞎吹，如果留得住，还留他住上一天半天，离去时还要送他两个大瓜。这是我向当地人学会的慷慨与大度。在这里，我和小鸟轻声絮语，对草原倾诉衷情，伴孤灯忆繁华落尽，狂躁的心绪在独处的宁静中得以宣泄和纾释。

10月瓜尽藤枯，无须看守，寒冬将至，农事日稀，大部分农场人员撤离回城，我也跟着回了单位。恰逢单位开展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运动，要求职工写大字报揭露机关的铺张浪费。我那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恶习难改，又胡诌出一张《近水楼台先得月》，历数机关后勤工作的诸多弊端。这是所有大字报中最具爆炸力的一枚炸弹，观者甚众，反应强烈。未几，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干校停办，精简人员，我首当其冲，被逐出教育厅，调往新疆西陲中苏边境上的塔城三中。行前开会给我做鉴定，人事科长首先训话：“你不思悔改，乱说乱动，不宜在机关工作。以后你在新地方要规规矩矩，检点行事，痛改前非。”我明白了，他说的“乱说乱动”定是指的那张大字报，我的档案里肯定又会增加一页新罪证。咎由自取，予复何怨，走就走吧。

亲历“伊犁、塔城事件”

塔城距乌鲁木齐千里之遥，紧靠中苏边界，晚上可看到苏联那边的灯光。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达斡尔、回、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城里有三所中学，其中两所是民族中学，我所在的塔城三中是一所汉族中学。校长是一位和善长者，对我很客气，生活待遇与其他教师一视同仁，教师对我也很友好，看不见异样的脸色。跟教育厅比，判若两个世界。校长为安排我的工作颇感为难，他坦诚地对我说：“你现在的处境怎么敢叫你教语文，可不可以改教数学？”我如实相告，我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只好安排我到教务处，做些了解教学情况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听课。听课后要跟上课教师交换意见，还要向教导主任汇报。这样，我不成了管教师的人了吗？显然与我身份不符。再有，我虽然从教育厅调来，但对教学是一窍不通，怎敢对别人指手划脚？因而给我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没办法，只好热炒热卖，找来几本教学法书籍，记了些新名词，煞有介事地和同事们商讨起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问题。不过，这时我已吸取教育厅的教训，牢记不要“乱说乱动”的训示，交换意见也好，汇报也好，我总是挑好的说，抹得上下都满意。生活教会了我圆滑世故。

过了三个月，精简下放运动从自治区发展到地市县级，学校也属精简范围，领导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写申请，表决心，我当然也不例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递交了申请书。不到半月，学校宣布我的申请已被光荣批准，而且是唯一被批准的人。感谢校长这位好心人的苦心运筹，可能是怕直接点我下放会使我感到难堪，才搞了这个人人写申请的庄严过场。其实他们心中早就有数，我这个被教育厅视

为多余的人，在这边陲小城也是一个多余的。

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只要头上有这顶帽子，什么不幸都可能随时降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我的直接上司教导主任是位心地善良的老大姐，积极为我张罗下放地点。她爱人是塔城县委书记兼十月公社党委书记，她说就到她爱人那个公社去，日后也好有个照顾，而且那里还有自治区科委几个下放汉族干部，可以住在一起作伴。

自从打成右派以来，这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关心我的人。老大姐的关爱大大缓解了我被抛弃的孤独感。我振作起精神，用发给我的最后一笔三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农业科技书籍，决心弃文务农，在广阔的田野上去重写自己的青春。从那天起，我就和单位彻底脱离关系，一无所有，成为赤条条的一介农夫，我的生活阅历也从狭小的单位扩大到纷繁万象的下层社会，让生命去接受更惊心动魄的考验。

十月公社离塔城 40 多里，我落户的新光大队一队是个农业队，离公社又有 20 余里。村子坐落在一个山口前，背倚巍峨雪山，面临波状莽原，用今天眼光看，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但当时我是一穷困潦倒的流放者，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美景！我被安排到生产队长家居住，主人是哈萨克族，能说简单的汉语，夫妇俩加一个小女孩，三口之家。男主人剽悍爽直，女主人文静温柔，夫妻性格迥异，但相处甚得。他们待我如亲人，照顾有加，劳动安排拔草等轻活，能干多少干多少，伙食不是牛奶煮面条，就是炖羊肉，比在单位强多了，不到一月，我就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根本不在乎我的贱民身份。我如实告诉他我是右派，他说公社已经通知过他了。他问我什么叫右派，我觉得简单几句汉话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就打比方说：“右派分子就是你们这里从前的巴依（哈语“地主”音译）。”他笑了笑，摇摇头：“不，你不是，你不是。”在这个憨厚纯朴的哈萨克人面前，语言显得多么苍白，习惯用政治概念图解世界的人怎么也无法理解表现在平民百姓身上那博大的胸怀。

我吃住在他家，大队每月只给他家拨一份我的口粮，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已是没有工资的人，不可能交伙食费，而他们根本就不在意。我不好意思白吃白住，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就是劳作之余帮助他们带带小孩。孩子只有一岁多，正呀呀学语，我用汉语教她叫“爸爸”、“妈妈”、“叔叔”，哭闹时为她拉拉小提琴，这孩子具有哈萨克人特有的音乐禀赋，只要一听到琴声就不哭了。孩子也很亲近我，收工回家，老远就向我扑来，抱着我“叔叔，叔叔”叫个不停。在这远离故乡、亲人的边塞山村，在受够世人白眼的屈辱之后，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人间至情温暖了我那颗冰凉的心，改变了我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偏执态度，相信人性的火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会熄灭。

1961 年春天，塔城地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边民外逃苏联的“伊（犁）塔（城）事件”，我目击了这次重大事件的一个侧面。

4 月的边疆，风和日丽，冰雪解冻，大地复苏，草原吐绿。牛羊走出圈棚在牧场上转悠，蛰居一冬的农民忙着准备春耕，草原一片宁静。一天，村子里突然热闹起来，三五成群的陌生人骑着马这家站站，那家停停，好像商量着什么，离去一拨，又来一拨。这反常现象引起了我们几个下放干部的警惕，担心是不是要出什么乱子，便悄悄去向平时相处甚好的年轻人打听。他们说，明天一早他们就要回老家了，到苏联去。他们解释说，他们父辈原来是苏联人，是 30 年代苏联搞集体农庄时逃到新疆来的。傍晚，我的房主人从公社开会回来，告诉我，公社开会布置明早集体越境到苏联去，问我跟不跟他们一起走。我感到事情太突然，太重大，沉思良久，无言以对。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犹豫，不再谈这事，就进里屋去取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十多张十元的人民币，说：“这钱在那边也用不上，就送给您吧。”我推辞不过，听他也说得在理，就收下了。我也拿出在乌鲁木齐工作时买的一件灯芯绒茄克衫，脱下身上的毛衣毛裤、皮鞋，尽其所有，全部送给了他，以感谢他们夫妇对我的兄弟情谊。晚上他们收拾东西，通宵未睡，我在炕上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何去何从，难下决断。

半夜时分，村子开始喧闹起来，鸡鸣犬吠，牛哞马嘶。走出房门一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套车，装东西，能带走的只有衣被等物，牲畜、家具、农具等大宗家产都毫不可惜地舍弃了。队长套好自家的车，便去组织各家各户准备上路。一时间，呼儿唤女，扶老携幼，车轮转动，首尾相接，庞大车队

浩浩荡荡开出村子。像归去的游子，像出征的战士，走得那么匆忙，去得那么从容，没有一丝眷恋，没有半点戚容。这大概就是游牧民族的豪爽天性吧。

村子里的人都走了，只剩我们几个汉族下放人员，不得不聚在一起商议去留，多数人主张走，我主张去边界看看再说。于是我们立即套了一辆马车，尾随而去。走到与其他村落交汇的路口处，只见各路车队越来越多，每到一个路口，又加入一支两支车队。上了通往边界的公路以后，马车、牛车、人流形成多路纵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只能缓缓蠕动。年轻人的歌声笑声，小孩的啼哭声，赶车人吆牲口的叫骂声，此起彼落。这景象只在过去描写战争的影片里见到过。平时只要一个钟头就可到达边界的路程，这天竟走了整整一天，下午5点才到达边界。

想象中的边界一定森严壁垒，其实完全不是。沿我国一侧看不到一根界桩，一个哨所，一兵一卒。脚下条约莫十多米宽的干涸小河就是边界。那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我国边界一侧完全不设防，号称和平边界。对面景象就大不同了。过河就是一道铁丝网，网后是一条20多米宽的松土带，据说兔子跑过这里都会留下足迹，更不要说偷渡者；松土带后是边防公路，装甲巡逻车间隔几分钟就驶过一辆，如临大敌。今天与往日不同的是苏联一侧边界铁丝网拉开了一个大缺口，后面是黑压压一大片临时搭建的帐篷，看样子早就做好了接待逃亡者的准备。这边的车队越过小河就从这个缺口进入苏联。

我们几个人想到对岸看个究竟，也跟着车队进入了铁丝网。这里车马喧嚣，人头攒动，高大的苏联军官，威严地虎视着人群，不时用马鞭指指点点，大声呵斥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有军人来给饿了一天的逃亡者分发面包，是苏联电影里见过的那种切成块的黑面包。有个汉族小伙子不识好歹，拼命往里挤，站在一旁维持秩序的军官，扬手就是几皮鞭，抽得小伙子抱头钻进了人群。那军官趾高气扬，怒目圆瞪，挥鞭打人如打牲口的神态，深深刺痛了我的自尊心，老大哥的形象在我心中顿时一落千丈。我马上问同伴见此情景有何想法，是去是留？几个原先决心逃异地的人这时都改变了主意，同声回答：回去！我们立即驾车离开了这个只呆了半个钟头的国度。

这次难忘的经历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民族感情。不管自己怎样受过同胞的凌辱，一旦面对异国民族欺负自己的同胞时，会不由自主地忘却宿怨，认同自己的民族。由此，我也联想到教育理论上的一个严肃的命题：抽象的道德理念，只有融入活生生的情感体验，才可能转化为有血有肉的道德行为。

据事后了解，这次边民大规模越境事件共有6万多人去了苏联，起因据说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有关。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苏联接壤，有不少原来从苏联跑过来的农牧民，没有苏联护照。50年代后期，领事馆开始给他们颁发苏联护照，领到护照的人就可以回国。当时我国生活极度困难，要求领取护照的人越来越多，领事馆应接不暇，又难以甄别，就说，你们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于是引发了这次越境狂潮。同时，在少数民族内部，又是一次有组织的严密行动。事前层层动员，统一了行动时间、路线，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少数民族干部负责组织指挥，一呼百应。加之边界没有驻军，地方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根本无法阻止如此大规模的越境行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几万人的越境行动，竟在一两天内完成，而且异常平静，没有出现任何暴力和破坏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刻骨铭心的爱情之旅

村民们走了，空荡荡的村落阒寂无声。牛羊满山跑，鸡鹅遍地飞，门窗洞开，院落狼藉，一派劫后景象。百多号人的生产队只剩我们七人，我们不得不重新谋划自己的日子。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了一座四面有围墙的宽敞院落作新居，收养两只凶猛的牧羊犬把守大门，以防不测。接着就是把满山遍野的牛羊赶进圈里，那是队里的财富，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再把失去主人的鸡鹅全捉到我们院子里养起来，想吃就吃，想卖就卖。然后到队保管室把一袋一袋小麦扛到我们住所，直到装满一间小屋为止。这样，我们真正有了自己可以支配一切的家，过着没有政府、没有组织、没有干部管理的自由而富足的日子。

半个月后，新疆建设兵团农七师的农工们才进驻我们这个生产队，重新有了政府，有了队长，有

了社会组织，生活又回到从前。新队长不仅没有批评我们把公家的粮食搬进自己私宅，把私人鸡鹅关进自家院子，以及任意宰杀羊羔等“恶行”，反而表扬我们立场坚定，没有外逃，而且保护了集体财产不受损失。公社也觉得我们几个下放人员不愧干部出身，应该有所照顾，就下令把我们从这个偏远的山区队，迁到了公社所在地的坝区阿西尔。

阿西尔是公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原来我们那个山区队的最大区别是，这里汉族居民较多，有不少新移民——来自内地的“盲流”人员。因此，我们的生活圈子已不再局限于几个下放伙伴，人际交往日益扩大和频繁，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新朋友，日子不再像原来那样寂寞。这时我们原来同住的七个下放人员已有四人陆续返乡，剩下一个广东人，一个山东人，还有我，组成单身小家庭。我们三人都是音乐爱好者，老广会弹三弦，老鲁会吹笛子，我拉小提琴，管弦弹拨三乐皆俱，组成一支小乐队，闲时在家吹奏自娱，谁家有婚嫁喜庆，常请我们去助兴，渐渐小有名气，脚迹遍及四里八乡。维吾尔、哈萨克的婚礼都很隆重，一家办喜事，全村都放假，男女老少全参加，喝酒、唱歌跳舞、叼羊是必不可少的三大节目，从凌晨狂欢到深夜，方尽兴而散，我们当然也是被盛情邀请，全程参与。

在一家维吾尔人的婚礼上，一次难忘的邂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狂欢的人群伴着我们这个小乐队的音乐节奏婆娑起舞，奔放柔婉的维吾尔舞姿令人如痴如醉。在跳舞的人群中，有一姑娘舞姿婀娜，外貌独特，引人注目：高挑的身材，深褐的长发，清澈的大眼，隆隆的鼻梁，白皙的肤色，兼有黄白人种的特征。乐曲终止，舞会暂停，在不可抗拒的引力下，我主动走近了她，请她唱首歌，我为她伴奏。她大方地笑了笑，爽快应道：“我唱《丽达之歌》，会拉吗？”这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在5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与《拉兹之歌》一起成为流行歌曲，我不仅会拉，而且会唱。她柔声唱了起来：“你是，我的心，你是，心灵的歌……”我凝神屏气跟着伴奏。令我惊奇的是，她不是用汉语，而是用《流浪者》电影里的那种语言（印度语）唱。她嗓音甜美，表情丰富，唱得凄婉动人，我也拉得很投入，思绪完全被歌词的意境所同化，引起强烈共鸣。

曲终歌尽，我们谁也不说话，似乎都在体味某种特殊的韵致。良久，我开口问她，怎么会用印度语唱歌，她娓娓谈起自己的身世。她父亲早年是印度华侨，在孟买经商，母亲是英印混血人。她出生在孟买，10岁时送回山东奶奶家，一直在国内上学，1957年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读书时遭遇与我相同的命运，毕业后在一所县城中学教书，一年前又和我一样被精简，跑到新疆来找工作，结果一无所获，流落到这里，寄住在一个孤老婆婆家里。相似的经历，相同的命运，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婚宴上她和我并排而坐，平时不喝酒的我，这天打破惯例，一杯又一杯，开怀大饮。她怕我喝醉，劝我节制，沉浸于狂热中的我哪里肯听，终于喝得酩酊大醉。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醉酒。

从那以后，我们来往日渐密切，感情上多了一份牵挂，生活上多了一人呵护，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是双双出现在各处的婚礼歌舞场所，就是并肩踱步在花朝月夕的溪畔林边。命运之神把我们随意抛掷在这个蛮荒之地，在经历了许许多多心灵和肉体的折磨之后，在爱已经枯萎、麻木，几近灭绝的时候，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走到了一起，爱的希冀和被爱的渴望，相互融合产生一种急遽膨胀的合力，紧紧地把我们凝聚成再也分不开的整体，为我们苦涩晦暗的生命天空抹上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我们小心翼翼地构筑着自己的爱巢，深怕有什么灾难会突然降临头上。

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此前我就有过两次爱的偶遇，结果都毁于我那罪恶的“种姓”。

不管怎么祈求神灵的护佑，意料不到的晴天霹雳还是降临了。

那天傍晚，我到她住处去。走到窗外，听见室内有男人的声音，推门一看，一个面容憔悴、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坐在床边正和她说话。她起身平静地向我介绍，这是从东北来的老乡，到这里来看望她。见她有客人，我就告辞回家了。

第二天清晨，我刚起床，她急匆匆跑来找我，神情焦急而难过，说有重要事情要告诉我。我们在屋后的苹果林里坐下，她嗫嚅道：“我不该瞒你，昨晚你见到的那个人是我丈夫……”

听到这里，我脑子“轰”的一声，不觉天旋地转，其震惊的程度绝不亚于听到宣布我是右派的情

景。划为右派是我政治生命的彻底毁灭，她有丈夫则是我感情世界的全面崩溃。她劝我冷静一点，听她把话说完。慢慢我知道，她是大学快毕业时结婚的，丈夫在沈阳某银行工作，也是右派，为了找她，把工作也丢了。

天哪，你为什么这么残酷地捉弄人，硬把三个命运同样悲惨的负罪生灵阴差阳错地拉扯到一起，导演出这场撕心裂肺的人伦悲剧！

我陷入了不可自拔的两难境地，感情和理智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感情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理智要我作出明智选择。她丈夫的命运已够惨了，我能忍心夺走他的妻子，把他推向绝境吗？对她，我更生不出怨恨，她是真心爱我，而且爱得火爆，甚至疯狂。她瞒着我，无非是担心惊破我的玫瑰梦，再回到现实的火焰山，能多厮守一天就多厮守一天，能多给一份慰藉就多给我一份，献出她的一切来抚平我的创伤。这不是爱的背叛，而是爱的神圣。我不能伤害他们夫妻任何一个人，我要摆脱眼前这尴尬处境的唯一选择就是立即从这里消失，把爱留在永恒的记忆中。

三天以后，没给她留下只言片语，我孑然一身，悄悄离开了塔城这伤心之地，痛苦地结束了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之旅。至于我走后会给她留下怎样的伤痛，这恐怕是一个等到地老天荒也解不开的死结。

以盲流身份回乡

离开阿西尔时，我只有变卖被褥衣物的 120 元钱，一把小提琴，几本旅途消磨时间的古典诗文，以及穿在身上的衣服，这就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全部家当。徒步走到县城，因身上没带任何证明，不能住旅店。当天晚上只好在公园里的舞台上以天为被，以地为席，露宿了一夜。次日到车站遛达，不知该往什么地方去。这时认识了一个从西安来的小伙子，他听人说伊犁自治州首府伊宁市好找工作，劝我跟他一道去那里碰碰运气。于是我登车去了伊宁。

伊宁是新疆第二大城市，西部重镇，城市规模大，单位多，以为能轻易找到工作，结果跑了十几家单位，都被赶了出来。白天像无头苍蝇到处瞎碰，日子还好打发，到了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才是最难挨的时候。旅馆有的是，就是不接纳“盲流”。有的“盲流”带有伪造的身份证明，我求他们帮帮忙。“盲流”多是江湖义士，从不拒绝别人的求助，帮我在旅馆登了记。睡前有“盲流”告诉我，每天晚上都有公安局的来查号，没带证明的统统抓进收容所，要我警醒点，事先看好逃跑的路线。睡到半夜，果然响起哨子声，有人推醒我：“抓盲流的人来了，快跑！”我跳下床提起衣裤就往事先看好的后门跑，那机敏，那速度好似被追猎的兔子。千幸万幸，我没有被抓住。这时我才庆幸当初轻装上路的英明。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天，再也呆不下去了，决定去乌鲁木齐，再到南疆去闯荡，我就不信北方不亮南方也不亮。

流浪生活虽只有几天，但我已习染几分“流”气，擦干眼泪，封存感情，四海为家，浪迹天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日愁和忧；眼前有什么路就走什么路，走到哪里黑就在那里歇。

汽车在石河子市停车吃午饭，旅客们都涌向食店卖牌子的窗口买牌子（那时各地餐馆都是先买牌子再端饭），我也挤进去掏出钱包买好牌子，顺手把钱包放回口袋。吃完饭师傅喊旅客上车，我掏钱包取车票，不禁大吃一惊，钱包没了！我的全部财产和珍藏——一百多元活命钱、车票，还有那位伤心人的照片，统统不翼而飞。我向司机说明情况，他还算通情达理，让我上了车，没把我丢在石河子。

到乌鲁木齐已是晚上，身上一文不名。市里有川大的老同学，本可以去求助，但看看自己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有什么脸去见他们？咬咬牙，还是决定自己救自己。当晚饿了一顿，在车站候车室挨到天明，饥肠辘辘，得想办法找饭吃。看看身边有什么可变卖的：小提琴舍不得，书不值几文钱。摸摸身上，一件毛衣，一件毛背心，一件肮脏的卡其布外衣。毛背心是心上人织的，饿死也不能卖，外衣没人要，能变钱的只有那件毛衣。好在这时已是 5 月，也冻不死人了，就决定卖掉毛衣。于是手拿毛衣，在车站见人就问：“买不买毛衣？”“买不买毛衣？”一连问了十几人都摇头。这时我才来了

个脑筋急转弯：车站都是旅客，出门人买毛衣干吗？看来必须找本地人，而且最好是老太婆，她们心软，对落难人有同情心。走出车站，在一个摆香烟摊的老大妈面前站住，向她诉说了我的遭遇。她听说我已一天一夜没吃饭了，便善心大发，花 20 元买了我的毛衣。现在 20 元钱不值一提，但在那时相当于我在职时半个多月的工资！

千恩万谢告别了老大妈，在一个卖烤馍小摊上买了个馍，边走边吃。这时，从后面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个陌生人，他拽住我的手臂叫我跟他走，我以为是抢匪，拼命挣扎，大声呼救。接着又上来两个人把我架住，不由分说挟持到车站后面一平房前停下，我一看是车站派出所。原来公安人员从我在车站卖毛衣那刻起就在跟踪我，现在把我当“盲流”抓起来了。

走进派出所看了看，里面已抓了十多人，以后又陆续有人抓来，到下午 5 点已有 20 多人。这时来了两个民警，把我们带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先叫我们在一间大屋子里呆着，我以为是等待询问，结果不是。到晚上 8 点，20 多人全部塞进一间没有窗户不足 10 平方米的黑屋里，屋角放着尿桶，溢出的尿水遍地流淌，臭气熏天。地上连一根稻草也没有，不要说躺下睡觉，就是蹲也蹲不下。大家都只有呆呆站着，垂着头，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等待长夜一秒一秒地缩短它跟黎明的距离。

第二天早晨 8 点准时开门放我们出来，排成一行照单人相。每人胸前都贴一张白纸，纸上大书一黑字：“收”。别人照相，我在一旁琢磨这“收”字的含义：是收监吗？我没犯法呀；是收钱罚款吗？我也没钱呀；还是……想来想去都不得要领。照完相，也不给饭吃，叫我们带上自己的东西（抓进来时身上所有东西都已收缴），跟民警走。一行人从城里走到城外，翻了两座山，在山坳里一座四面有高墙的大院门口停住，门上挂着“乌鲁木齐市收容所”的牌子。我才省悟照相时胸前那“收”字的含义原来是：此人已送收容所，照片留公安局存档。听以往被抓进过公安局的“盲流”说，凡是抓进公安局的人都要照相存档，作为有无前科的依据。如果再次被抓来，就没有第一次那么轻松。

这座收容所是个四合院，进门是办公区，两侧是被收容人员宿舍，后排是伙房。我们刚收进来的人住在东边一间空屋内，地下铺有麦秸，但没有被褥。其他房间都住满了人，有的在麦秸上睡觉，有的在墙边打盹晒太阳，有的三五成群蹲在地上自画的棋盘前，用碎石作棋子，神情专注地攻战杀伐。看样子，关在这里的人都很悠闲。我两天一夜只吃了一个馍，饿得直不起腰，躺在麦秸上发愣。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四川老乡是刚从家乡来的，偷偷从自带的棉被里掏出个小口袋，里面装的花生米，独自吃了起来。这时我再也顾不得什么体面、羞耻，伸手向他索要，他大大方方抓了一把给我，暗示我吃时要用手掩住嘴，不要被别人看见。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万一被管理人员发现带有食物，会立即被搜走。好不容易等到午饭钟响了，“盲流”们拔地而起，一窝蜂飞步奔向伙房，排成长队领饭。一个馒头，一碗菜汤，这就是午餐。我怕几口吃完看见别人还有会流口水，就把馒头掰成指头大的小块，放进嘴里让它慢慢溶解成液体，再咽进肚里。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慢、最香也最不解饿的一顿饭。

吃完饭跟先前关进来的人交谈，才知道收容所以对收容人员有一套独创的管理方法。他们对关进来的人不打不骂，也不滥用刑罚，而是采用“饥饿疗法”以示惩戒。每天配给 3 两粮，加上一点白菜帮子，三餐改成两餐，饿得你七痨五伤。其意图有三：一是迫使你尽快交待自己的来龙去脉，便于送你回家；二是让你知道收容所不是招待所，关进来住了一夜收容所，是要付出代价的，怕挨饿以后就别“盲流”；三是那时粮食紧张，普通居民每天都只配半斤粮，全国老百姓都在挨饿，你“盲流”还能吃饱？听罢此言，我才恍然大悟，先前看到“盲流”们那派悠闲自在景象不过是他们用来对付饥饿的招数罢了。我暗下决心，必须尽快脱离这饥饿的苦海。

我不等传讯，立即主动找到办公室管理干部，交待了我的家乡地名，要求遣返回乡。怕他们再把我送回塔城，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及在新疆的一切经历，编造了我是来新疆找工作的鬼话。以为很快就可送我回乡，结果并不那么简单，此后再没有人过问，把我继续泡在收容所。第三天，我实在不堪其饿，便拉起无论怎样潦倒也不忍舍弃的小提琴，驱赶饿鬼，碰巧伙食管理员从门口经过，听见琴声，出于好奇，便进来问我是哪里人，听口音他是四川人。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开口便说：“老乡

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一听，乐了，要我中午开饭时到伙房去一下。中午我遵命走进伙房，他叫我就在里面吃饭，不要出来。这一顿是我离开塔城后吃的第一顿饱饭。从这天起，有这个老乡关照，我的日子不再那么难熬，对于遣返已不那么迫切。心想，只要有饭吃，你愿泡多久就泡多久吧。

过了半月，收容所已人满为患，开始遣返。说起来令人不敢相信，我们乘坐的竟是专列，整列火车全是遣返人员。车到兰州，住了一夜收容所，遣返人员按省区在这里分流；四川的送到广元收容所，关了5天，又按地市州分流；绵阳地区的送到绵阳收容所，又关了5天，再分流送往各县收容所；最后送往我家乡三台县收容所的只我一人。

在历尽边疆寒冷和饥饿的折磨，饱受感情和人格裂变的剧痛之后，总算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家乡了。回家那天，老父大吃一惊，做梦也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见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满身腥臊，不禁老泪纵横，哑然无语。在他的想象中，我不应该这个样子回家。

脱胎换骨成为老农

回到梦绕魂牵的家，疲惫不堪的身心本应得到一点安息，但家庭的巨大变故使我伤心至极。慈爱的母亲三年前为我的不幸命运忧思成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永远闭上了眼睛。听老父说，母亲临终前一直呼唤着我的小名，希望能见我一面，而那时我远在新疆的戈壁滩备受煎熬，连老人家去世的消息都不得而知。如今在母亲的坟莹前能见到的只有青青墓草，点点昏鸦。老父已经70多岁，还要佝偻着身躯在田间耕作。父母为我操劳一生，不仅没享我一天福，还要为我担惊受怕。看看家里，还是土改时分地主的两间土屋，一架木床，一张饭桌，几个破罐，这就是全部家产。良心的自责，灵魂的伤痛，家庭的贫困，生活的艰难，一齐向我压来，使我焦灼万分，寝食难安。这时，我才意识到，家乡不是避风港，家庭不是安乐窝，穷山沟的生存之路将更加难走，境况将更为困厄。

我要面对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必须适应山区繁重的体力劳动，用筋骨和汗水去挣工分养活自己和老父。第一天参加劳动是挑粪水上山淋玉米。挑担是山区农民的基本功，就像少林寺和尚练功是从双手提水开始一样。无论播种、施肥、抗旱、收割、送公粮，乃至家务活，无处不用肩挑，挑不起百八十斤就不能叫“主要劳动”（当时农村把劳动力分为“主要劳动”和“附带劳动”两大类，前者一般指能干重活的男性青壮年，后者指只能干轻活的妇女、老弱、少儿），不是“主要劳动”每天就挣不到10分，就分不到一斤粮食。我想挣10分，就必须首先学会挑担，成为主要劳动，干重活。其实，挑担这活我并不陌生，在川大毁操场办农场时就经常挑粪，不过那是平路，距离也不远，挑的担数也不多，又不是每天挑，并不觉得怎么吃力。现在不同了，挑上百来斤的粪水，还要爬行一两里山路，每上升一步都气喘吁吁。随着趟数增多，肩膀越来越疼，步子越来越沉，汗水淋漓如雨。我率性脱掉上衣，赤膊上阵，任烈日炙烤。毕竟我是吃过苦的人，一天终于坚持下来。但到晚上睡觉时，肩膀肿痛难忍，背上皮肤全变成了水泡，火辣辣如针刺一般，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动弹不得。咬牙熬过第一天，日子一久，挑担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练就了一双能承担任何生活重压的铁肩。去区收花站卖棉花，翻山越岭20多里，百斤重担两个钟头就能到达。到县城挑化肥，40里山路，中午还要回家赶午饭。凭这本事，我挤进了“主要劳动”的名单，每天可挣10分以上（折合人民币壹角伍分，秋收时可分到1斤粮食）。

1964年冬天，乡里大兴水利工程，我被派到水渠工地劳动。工地有两种活，一是挖明渠，一是抬石头。抬石头比挖明渠苦得多，但工分高，我想挣高工分，就选择了抬石头。我是第一次干这活，以为只要担得起就一定抬得起，其实不然。四人抬一条重约千斤的长条石，决非易事，必须起落一致，步伐一致，用力一致，既要个人有过硬肩力，又要整体协调配合；怎样套绳，怎样用力，怎样跨步，怎样喊号子都有讲究，稍有不慎，就会伤人。这一切我都得从头学起，所幸我已有挑担的基本功，再经同伴指点，自己悉心体会，抬上两趟也就学会了。只是压在肩上那两三百斤的重量大大超过以往在队里挑粪水，一时难以应付。石头一压上肩，小腿就不住颤抖，腰也伸不直，这时只有靠集体喊号子来

壮胆、运气，把憋在胸中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转化为向前跨步的动力。为了把喊号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自出心裁，把一些节奏感强的歌曲如《大路歌》、《解放军进行曲》等，编排到我的号子中去，把对重量的注意力转移到对音乐的体验上去，通过释放和转移的心理效应，肩上的重负和心中的苦况都大大减轻，抬石头不再是不可逾越的生命极限。

总算闯过了担抬这一关，农村最艰苦的活计已被我征服。队长说，你只会担抬还不能算“全挂子主要劳动”（即技术全面的劳动力），还要会抛粮下种，犁牛打耙。想想也是，只会干担抬等粗重活，不过是一头会说话的牲口而已，怎么算地道的农民呢？于是，我又开始学抛粮下种，犁牛打耙等技术活。其实这些活并不复杂，只要稍动脑筋就能学会，而且比担抬活路轻松得多，工分也高得多。不久，我成了队里为数寥寥的专业犁耙手，每天给牛充老子，身份由“主要劳动”升为农民技术职称最高的“老农”。有了这“老农”身份，就可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每天只需手拿鞭儿，跟在牛屁股后面，慢悠悠地吟诵自己的风花雪月，耕播自己的喜怒哀乐。

当犁耙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自由，不受集体出工收工的限制，上午可早出早收，下午可晚出晚收。这样，中午就空出大量时间，我就用这段时间在家搞起了竹编。我家屋前屋后都是竹林，就地取材不用买；不会编就找来样品拆开比着做，在实践中去学技术。不久，什么簸箕、箩筐、竹席、晒簞等都会做了，除家用外，逢场天还可拿到街上去卖几块钱，买点针头麻线、麻花油馍之类回家，逗老婆孩子喜欢。

至此，我基本上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由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倒霉读书人变成一个从外貌特征到生存状态都完全泥土化的乡间老农。

贫贱夫妻百事哀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的空壳家庭迫使我不得不寻求精神寄托和生活伴侣。亲人们为我物色过两个对象，都因不是她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她而告吹。最后还是我教的农民夜校里的一个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和我同队，每晚夜校下课都陪我一道回家，渐渐亲近起来。平时我看她干活很能干，手脚麻利，凡是计件农活，她比一般妇女都干得快，因而挣的工分也高。身体也十分健壮，不怕吃苦，敢和男劳力一起担粪水，送公粮。性格也很泼辣，是典型的“川辣子”，谁要是无礼于她，会骂得你狗血淋头。还有她家是贫农，在那个以阶级成份定身价的年代，没有人敢欺负她。更重要的是她脑子里没有僵化的政治标签，不嫌弃我是右派。有这几条，我觉得她就是我心中的黑牡丹。

一天晚上，大队放电影《白毛女》，我约她一起去看。白毛女的悲惨遭遇看得她不停地抹眼泪，没想到一个识字不多的村姑感情世界还如此丰富。回家路上，我为她轻轻唱起大春思念喜儿那段插曲，她不禁紧紧抓住我的手，我趁这感情热线接通的瞬间向她表白了爱意，她腼腆地接受了。不久，大哥为我作媒，向她父母提亲，未遭拒绝，但她哥哥是民办教师，坚决反对。不过，她本人态度坚决，又得到父母支持，她哥哥反对宣告失败。为这件事，我们婚后若干年她都不肯跟她哥哥来往。我们于1965年7月1日结为夫妻，这年她19岁，我31岁。

婚后的生活没有文人小说里写的那么多浪漫和甜蜜。经过岁月的涤荡，我的感情已洗尽浮华，只剩下农民居家过日子那份沉实，正好和妻那纯朴的感情表达方式相融洽，共同演绎着苦难年月那段质朴无华而又感人肺腑的乡村恋曲。

那时生活很困难，每到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揭不开锅时，她总能从外面弄几把青豌豆、青胡豆什么的回来，加点自留地里的牛皮菜凑合着过几天，而我却没这本事。家里没有油盐钱，她除了拼命干活多挣工分外，还会在中午收工后顶着烈日到山上割梭草（一种可制绳、造纸的纤维植物），卖了换回一两元钱补贴家用，而我就吃不了这个苦。她看我在队里干的多是重活，体力消耗大，每顿煮饭时不搅动锅里，让可怜的几粒米沉淀在锅底，盛饭时总是把锅底较干的饭舀到我碗里，自己喝锅面上的稀汤。“文革”那阵我挨批斗，她不是用眼泪来稀释我的悲哀，而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煮给我吃，

狠心把要拿去变钱的鸡杀了给我补身子。如果私下听见有人骂我右派如何如何，她会挽起袖子跟别人厮打。人前人后，从未因丈夫是右派而觉得矮人一等，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从不低下她那高昂的头，和我的怯懦形成强烈反差。就是这样一个朴实、坚强、泼辣的女性与我这个“十恶不赦”的背时鬼携手，并肩走过那段长达15年的风风雨雨。

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儿子，一个只活了七天的儿子。她分娩那天，恰逢我去公社参加“五类分子”义务劳动，家里只她一个人，她又没有分娩经验，不知经过怎样的痛苦挣扎，胎儿才坠落地上。同院邻居一位大娘听到婴儿哭声和妻的呻吟声，赶紧过来，用传统方法结扎了脐带。等我晚上回家，看见又白又胖的儿子甜甜睡在妻子身边，我兴奋得俯在儿子脸上亲个不停。第五天，孩子吃奶出现异常，舌头裹不住奶头，啼哭不止。我马上上街请来医生，医生诊断后开了药方，说这药如果吃了不见好转可能麻烦。果不其然，服药无效，第二天出现抽搐，服药打针更无效。第三天抽搐加剧，全身僵硬，向后强直，像一根扁担。见此惨象，我痛苦万状，欲哭无泪。到晚上，躯体渐渐冰凉，一个来到世上只有七天的稚嫩生命就这样无情地被死神抢走了。医生说，孩子死于结扎脐带没有消毒而感染的新生儿破伤风。

1967年我们又添了个女儿。这次吸取第一次孩子夭折的惨痛教训，临产前一个月就做好了接生器材的消毒工作，预产期内守在家里哪里都不去。这次是我亲自接生，女儿顺利出世。由于妊娠期间营养不良，孩子十分瘦小，体弱多病，经常感冒，一感冒就出现哮喘。断奶期间，孩子营养更成问题，用瓦罐煨点米粥放点猪油就是她的营养佳品。一岁后就和大人同锅吃饭，她饭量小，又挑嘴，不吃红薯、牛皮菜，而这正是我们大半年的唯一主食。奇怪的是，这样恶劣的饮食并没使她变得面黄肌瘦，反而一天天胖起来，那红扑扑的脸蛋，亮闪闪的大眼，十分逗人喜爱。但有件事叫我们十分忧心，孩子3岁多还不会说话，以为是个哑巴。在我坚持不懈的诱导训练下，慢慢会说话了，5岁时口齿已十分伶俐。家里有这样一个费尽千辛万苦抚育出来的可爱女儿，给我们没有笑声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

1973年冬天，女儿刚满5岁，一场惨绝人寰的生命浩劫突然降临她的头上，我再次坠入感情崩裂的无底深渊。那天凌晨，妻把饭做好，喊女儿起来吃饭，没有反应，以为睡着了，再喊，还是不应，走到床边用手摇也摇不醒。我一看急了，忙掐人中，毫无反应，女儿已深度昏迷。我立即跑上街请医生，我们家距街五里路，医生不愿下乡，要我把孩子背到街上去。我又急忙回家把孩子背到卫生院，医生切脉良久，沉重地说，已摸不到脉搏跳动，赶快送县医院。这时已是中午。

回到家里，家无分文，又马上跑到生产队借了20元钱，午饭都顾不上吃，急匆匆背着女儿往县城跑。那时乡里不通公路，只有步行，天快黑才赶到县医院。先到急诊室，两个值班医生正在闲谈买家具的事，眼睛瞟了瞟我怀抱里深度昏迷的女儿，连问也懒得问一声。在我一再哀求下，才慢吞吞地作例行检查，一会儿量体温，一会儿抽血，一会儿抽脊髓，就是不作任何急救，足足折腾了将近一个时辰，才叫我到住院部住院。住院部医生见状立即抢救，挂上输液瓶已输不进液了，血液反而倒流。晚8时，女儿停止了呼吸。我抱着女儿微温的躯体，放声大哭起来。上苍啊，我究竟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孽，你会把人世间所有的不幸都编排到我的人生履历里，让我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去经受风刀霜剑的无情摧残！惩罚了我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去惩罚一个柔弱无辜的小生灵？

记得头天晚上吃饭时，她端着一碗牛皮菜煮红苕，哭着不肯吃，她妈忍不住打了她一巴掌，才喝了两口汤，然后带着泪痕睡了，没想到这就是她最后的晚餐，再也没有醒来。生前爱漂亮，嚷着要穿一件花衣裳，这个在任何家庭的小女孩都会有的小小愿望，作爸爸的都无法满足她，如今穿着她姑妈的女儿小时穿过的一件破棉袄离开了人世。活到5岁没吃一顿好饭，没穿一件新衣，草草结束了自己刚开始的生命。只怪她投错了生，找到我这个不中用的爸爸。

我止住抽泣，问医生女儿患的什么病，医生说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低血糖昏迷，延误了治疗时间，如果能在发病两小时内送进医院抢救，还不至于死亡。我没有能力阻止时间的运行，把这个“如果”变成“必然”，只好放弃对女儿死因的深层追索，不得不回到可以轻易破解任何生命难题的宿命论上

来：天意如此！

苟全性命于乱世

我回乡那年冬天，区上布置各大队、生产队都要办农民夜校，开展扫盲工作，帮助没念完小学的失学青少年完成小学教育。队长把我们队办夜校的事交给了我，这是我离开川大后做的第一件与文化沾边的事，自然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队长把房子找好，我负责布置教室。门板当黑板，石条当课桌，墙上贴几张标语，俨然一所乡村小学。开学那晚，不管是不是入学对象，全队男女青少年都来了。第一夜没上课，教大家唱《社员都是向阳花》，那时农村没什么文化活动，年轻人能聚在一起，唱唱歌就是最大的乐趣了。我这办法还真灵，以后每晚学员们都来得很整齐，入学率百分之百。

全校 30 多人，从扫盲班到小学一至五年级都有，一个晚上要上六个“班”的课，我是六个“班”的老师，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规模之小，班数之多，教师之少，设备之陋，恐怕算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学校了。从当年 10 月到次年 6 月夏收，学校上课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公社统一测评，学员成绩都在良好以上。凭这入学率、巩固率和办学的生命力，我这所夜校在全区农民夜校评比中得了先进称号。当然，我做的这一切都完全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图的是不要让生命与文化绝缘。

“四清”那年，公社办农业中学，党委书记听说我会教书，准备让我去当教师。这事不知怎么被“四清”工作队知道了，对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个大学生怎么会跑回来当农民？于是找我谈话，我怕以后惹出麻烦，如实亮出了我的右派帽子，这帽子把他们吓出一身冷汗，险些用了坏人。不用说，当农中教师的事就泡汤了。

我的右派故事很快成了乡里的头号新闻，我因而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五类分子”应享受的各种非人待遇，当然不能例外，但“五类分子”做梦也不敢想的好事有时也会落到我的头上。比如大队团支部开展各种活动就常常请我这个早就被开除团籍的非团员参加，教他们唱唱歌呀，写个快板、花鼓词呀，排练文艺节目呀，演出伴奏呀，等等。这些场合他们不管我的右派身份，老师长老师短喊得很亲热，我也忘乎所以和小伙子姑娘们打得火热。

“文革”初始阶段，还没祸及“五类分子”，那时各大队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大队团支部在开展文化活动方面本来就走在全公社前面，这时当然更为活跃，很快组建了宣传队。他们根本不在乎我是右派，请我当了宣传队的辅导员，排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和一些小歌舞，这是全公社唯一能排大戏的宣传队。先在大队各生产队巡回演出。接着又被公社指派到各大队演出，后来又被邻近几个公社请去演出，最后调去县上参加汇演。参与这些活动，虽然挣不到工分，年终分配要减少收入，但可降低体力的过度透支，缓解心灵的桎梏，转移对自己不幸命运的关注，忘却现实的严酷，在麻木中苟全性命于乱世。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我的日子变得严峻起来，一次又一次戴高帽，挂黑牌，游村游街示众挨批斗。第一次游街批斗回来，心里很难过，觉得面子扫尽，吃不下饭。妻见我垂头丧气，中午特别炒了一盘鸡蛋，边往我碗里夹菜边劝慰说：“你看公社党委书记都陪你站在一起挨斗，你有啥想不开嘛！”她这一简单的类比推理，胜过我读万卷书。从此，我把这么多年都折磨不掉的自尊心当作精神枷锁彻底砸碎，以超然物外的心情视游街批斗为少儿游戏。视角一变，心境大变，它果真变成了游戏。不信请看：

批斗我的那些造反派大小头头，不少是我在搞宣传队时结识的小青年，不要看他们在台上对我声色俱厉，强词夺理，无情批判，煞有介事，但在背后却帮了我不少忙。比如，游街示众时给别人戴的高帽子，里面都装有荆棘，很刺肉，给我戴的里面装的却是稻草。又如，明天如果要开批斗会，当晚会有人来报信，教我应对的办法：游街时他们会派专人来揪我，要我主动把头向后仰，他们揪头发、扭胳膊只是做做样子。再有，批斗会开始，台上喊“把右派分子×××揪出来示众”时，要我主动跑快些，自己跑上台，不要被他们揪住，可免受“坐喷气式”之苦（“坐喷气式”是“文革”中整人的

一种方式，具体做法是：两人在后分别拽住被揪斗者的一只胳膊，用力向后扭，像喷气式飞机的双翼，一手拽住被揪斗者的头发用力向前摁，像飞机的机头，使被揪斗者的头和手臂形成强烈的反向张力，产生撕裂般的疼痛)。还有一次，公社造反派头头计划晚上开批斗会，打人的柴块准备了一大堆，准备专门收拾几个他们认为最坏的人，我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可能他们认为我在宣传队跟某个女知青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其实根本没那回事)，他们派一个知青来抓我，这位知青与我相识，走到半路就回去交了差，说我不在家，使我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事后他告诉我，那晚挨斗的人没有谁不被打得死去活来。

我在“文革”中虽然精神上受到残酷折磨，但还未遭受多少皮肉之苦，这不得不感谢我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朋友们。

超然一点看，“文革”千真万确是一场疯狂的游戏，只不过与一般游戏不同的是，它是以整整一代热血青年的灵魂迷失与青春荒废为沉重代价而记入历史。

平反后的意外打击

1978年落实政策时，一则内幕消息惊得我目瞪口呆，令人啼笑皆非。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一个干部(是我的同乡)告诉我，因为我是从新疆“盲流”返乡，我的右派身份是自己交待的，也就是口说为凭，没有任何组织材料为依据，所以落实政策遇到了麻烦。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的右派帽子的真实性，现在快熬到头了，我这个右派反而有点不够资格了。既然我的右派身份没有实据，为什么把我当右派折磨了十几年，公社还正儿八经宣布给我摘帽子？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不知道是现实嘲弄了历史，还是历史嘲弄了我，反正我陷入了哭笑不得的窘境。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再次向组织交待我在川大被打成右派的经过，以及我的档案可能存放的地点。县落实政策办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先后三次去信新疆塔城地委统战部，过了半年，终于收到从新疆寄回的档案，落实政策才有了依据。同时我本人也积极向川大中文系老同学求助，川大党委于1979年3月给我寄来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通知。这样，长达20年的冤案才得以昭雪，迎来我生命史上的第二次春天。

至此，我本来可以平心静气地告别过去，面向未来，不料还有更令我伤心的消息接踵而至——

也是落实政策办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打开我的档案，里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1961年已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听到这迟到了18年的特大喜讯，我不仅笑不起来，反而气得我七窍生烟，痛得我老泪滂沱。1961年我才27岁，刚下放十月公社，距塔城不过咫尺之遥，这么生死攸关的大事为什么不通知我，为什么不宣布，而让我无辜忍受长达18年的灵肉之苦？人生中最宝贵的英盛年华，就这样白白付诸东流。我该向谁讨回青春？向谁倾诉因这一失误而导致一个鲜活生命的毁灭？

问天无言，问地无语。起诉已没有被告，申诉已失去时效。正义和良知早已失落在那个狂悖时代的茫茫迷雾之中，杳无声息。往者既已，那就姑且把这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苍凉诘问，连同用我半生血泪酿成的千古遗恨，统统都尘封在绵延无尽的历史卷帙中，让后人去评说吧！

原载《红岩春秋》杂志2003年第五、六期

八十年一梦

白桦

(2011年10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文化人，和所有中国文化人一样，有着来自传统的先天缺陷。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命题，至今都没有在观念和实践上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解答，那就是爱国与忠君。

什么是爱国？爱国是对于母体发自内心的感恩和依恋。忠君是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忠君是卑微的、盲目的屈从和崇拜、可耻的助纣为虐。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的许多精英，却套在这两个相反的概念拧成的一根绳的绳索里，困感到死。屈原爱到生命难以为继的爱是楚王统治下的楚国，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父母之国。历史书里，绝大多数忠臣良将都是忠君到死。岳飞的“壮怀激烈”是为民请命，同时也是为了“靖康耻，犹未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最后是为了“朝天阙”。1982年我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过一部话剧《槐花曲》，假设岳飞在风波亭被处死之前，回顾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漫漫征途，从而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一些另类的思索。很明显，我试图通过这部话剧解开这根“三千年之绳”，感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受了这部作品，进行了彩排。遗憾的是，彩排那一天，偌大的观众席上只有我一个人。大幕徐徐降落之后再也没有升起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一部电影剧本里，我只不过提出了一个天真烂漫的问题：“您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您吗？”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振聋发聩，有人认为实在是大逆不道。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古老的困惑呢？

其实，一百年前答案已经有了，而且已经付诸实行。——那就是走向共和。

但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整体，在实践中的分辨能力却相当之低下。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随着长期帝王独裁统治的历史重复更迭，“帝王至尊”一直深入人心。拜历代封建文人之所赐，帝王和他们的统治制度，始终联系着亿万民众的渴望。臣民长期过着没有起码的尊严、自轻自贱的日子，却把皇帝强加给自己身上的诸多灾难都当作恩赐。被凌迟处死，还要谢主隆恩。甚至会为因穷奢极欲而亡国的帝王悲哀、惋惜。皇帝真的是天子吗！真的是天生的英主吗？我们的史学家很少把历史上皇帝的真相告诉后世的人们。其实，除了少数几个开国皇帝，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低能儿或畸形儿，皇帝的所谓教养来自——也只能来自老朽的文臣，以及身心残缺的嫔妃、宫女和阉人。很多史家或由于自保，或由于逢迎，或由于为尊者讳，独裁者的面容都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彩绘。特别是一些做历史小说、拍电影、电视的人，林林总总的“王朝”系列、“大帝”系列。正说者有之，戏说者亦有之，大多数都在渲染“皇权天授”的理念。在每一个皇帝身上都注入了太多的英明、仁慈、优秀、神勇、刚毅。其实，天下最自私的人就是一小撮独裁者，他们的全部目的就是死守他们的皇位。他们的伎俩就是在超级强大的武力镇压和威胁下，致普天下万马齐喑，让臣民心甘情愿地接受镇压、杀戮和奴役，还要山呼万岁。譬如在某些文化人倍加欣赏的清代雍正、乾隆两朝，皇帝对“非议时弊”者斥之为“狂吠”，并以刀封喉。所以我们的历史只能是一部大多数人在昏君治下，不断祈求上苍恩赐一个有道明君出世的历史。中国的智慧有意无意都在为帝王献策，甚至很少考虑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期待，甚至连自己的存在都忘得干干净净。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确实是“一日不可无君”，就像毛驴的脊背上失去沉重的粪筐一样，时刻都不得安宁。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拱手把大权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仍嫌不够，经过三年筹划，居然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五年——1916年元旦登基称帝。虽然很快遭到共和人士的激烈反对而溃败。但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九龙宝座，并未从此崩塌。袁世凯生前死后被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仅仅一年，又有张勋复辟。张勋的辫子军只有区区五千之众，他把一个被废弃的“小皇帝”扶起来，居然闹得煞有介事，沸沸扬扬。连京城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而且供不应求，有些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来支应门面。许多人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猪尾巴”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学识渊博的康有为似乎早有预见，提前蓄了发，而且在张勋复辟之日，得意洋洋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王公贵族、遗老遗少

是为了捞回失去的天堂，平民百姓为了什么呢？当然是脑子里的“神圣皇权”在作怪。幼时，每当我看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史料，总觉得实在滑稽可笑。可是弄明白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口号之后，弄明白他们以“国情”为借口，实行无限期的“军政——训政”，“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时候，我就笑不出来了。他们维持一党专政的秘诀，依然靠的是警、宪、特务。国民党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那里得到丰厚的政治遗产，冠以“中华民国”的名号。除了剪了国民后脑勺的辫子，最醒目的变化是茶馆酒肆的墙上贴了许多“莫谈国事”的标语。谁都知道，那并非政府的公告，而是国民对自己的警告，说明有些国民已经开始懂得，这就是不打出龙旗的帝制。政府时不时杀戮一批异己，有时公开处决，有时秘密暗害。国民又顺理成章地成为臣民。国民党一直把“训政”训到台湾。所幸，蒋介石传位到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没有继续“训政”并传位下去，才戛然而止。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我出生在 1930 年。

八岁，我亲眼看到抓鱼游泳的小河被日军当做屠场，玫瑰红的河水在我脚下流过。

十岁，日本宪兵从我手里抢走我的父亲，我一辈子都懊恼自己的的膂力太小。父亲被关押、被拷打、被活埋。

十一岁，我远走他乡，半工半读。我坚信是在为复仇积蓄力量。

十六岁参加学生运动，我坚信我是在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呐喊。十七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坚信我是在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

十八岁，我在淮海战场大雪和炮火覆盖的塹壕里，咬破右手中指，写了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坚信我是在为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而献身庄严宣誓。

十九岁，1949 年十月一日，我随军踏上中山先生的乡土，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孙先生！革命已经成功了！我坚信中国革命真正是彻底成功了！

二十一岁，进入文坛，我坚信我的作品是崭新的、革命的文学。

二十五岁，仅仅因为送给胡风一块大理石砚台，被隔离、批判、审查八个月，我坚信是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因为胡风是反革命（虽然我一直都把他当做“歌德派”，他也确实是“歌德派”）。

二十七岁，仅仅是说了一句要允许文化人具有个性和自己在文艺上的爱好，文化人的协会不应当是衙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二十多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我坚信党和毛泽东没有错误，错误在于我自己。

三十六岁，以我的全部作品作为罪证，被隔离审查七年。我坚信，连郭沫若都自轻自贱，赌咒发誓自认罪名，我算什么。一直到十年浩劫，让人震动的是：不少被迫自杀的著名学者，在遗书里只有两个内容。一是高呼冤枉，表白自己的赤胆忠心，再就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就是古代皇帝赐死后的“望阙谢恩”吗？当“万寿无疆”的颂词每天套红在报纸上出现并声震云霄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不就是清末唯一可以让垂死的西太后哈哈一笑的声音么？

1967 年夏天，我在被隔离中，偶然在一张飘落在地上的造反小报上，瞄到一则“捷报”，写着：“特大喜讯：红卫兵们在某古宅抄家，抄出了十面黄龙旗！他们随即登上城墙，面向北京挥舞黄龙旗，向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宣誓，表达自己的无限忠诚。”顿时，我的困惑消失了！一种转换为疼痛的羞耻感袭上心头。

那时，距离辛亥革命已经五十六年了；今天，时光又过了四十四四个年头，加起来整整百年。

文革后期，我才开始独自反思自己的一生。我才开始有了疑惑！回首历史，那些曾经被我们嘲笑过的历代士子，包括曾经出将入相的能臣、佞臣，他们为了依附皇权，极尽谄媚、逢迎之能事，演绎了多少悲剧和闹剧！深知他们可笑而又可怜。此时我才醒悟到：我自己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么？但当时连这种醒悟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就是1981年春天我被举国媒体讨伐的原因。

当第一篇批判文字铺天盖地出现于报端和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几乎同时，声援我的电报和函件如雪片般飞来。于是，我坚信：中国人开始在泥淖中拔自己的麻木的腿脚了，虽然拔得很辛苦！

剧坛女杰徐九虎——对母亲一生的追忆

叶巧明

在前些年中国话剧界，提起重庆导演徐九虎，应该是声名远播、无人不知的。这不仅是因为话剧界的女导演为数不多，硕果累累的也有限，而且我想，这还因为她的名字特别——你想想，一个女人，冠名“九虎”，既威猛，又响亮，上口易记，世间少有，因而能让人印象深刻。我猜想，面对她这样一个话剧界的女强人，向她询问名字由来的人绝不在少数。

有人说，人名是一个人的名片，其名字的用字涵义，有时候可能影响人的一生。徐九虎因为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因而她要努力创造一个和她名字匹配的响亮人生，所以她终生奋斗，创造辉煌。这种说法，我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母亲名字的由来，据我所知，当初绝没有人们推想的这么神奇和高深。

22

翻看母亲填写的简历和表册，有一个曾用名——尤梅。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诗意名字。其实，这来自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事实：1920年3月，我外婆生下她，她一声啼哭，就送走了她的娘亲，家里人都叫她“送娘儿”。就在这个家庭，20余年前她的同父异母的大哥，我的大舅，也是一个“送娘儿”，我外公在前外婆去世的10多年里既当爹又当娘地带大了我大舅才又娶了我的外婆，外婆生了二男三女，大舅特别疼爱与他同命相怜的我母亲。母亲就由她大嫂奶大，外公因外婆的去世，也无心成家而全部交给了大舅。因此她成了家庭中最小的和最后一个女孩，大家都叫她“幼妹”，就是最小的妹妹。我舅舅和姨妈给我母亲写信，开首都称“幼妹你好”。“尤梅”，就是“幼妹”的谐音。

同样道理，徐九虎的名字也不神奇。我外公当年在宜兴属“小土地出租”，家境殷实，有点文墨，他的下辈儿女是“虎”字辈，但起名字时应该“属虎不读虎”，名字中都有虎的偏旁，又不读虎。我二姨妈被起名“徐簾”（音“迟”，古时竹管乐器）。既然我妈么妹是老九，于是起名“徐虬”（音“肖”），“虎”字边多了个“九”字偏旁，这“虬”字的意思是“虎的吼声”。但是，这个字比较生僻，许多人不知怎么读，干脆就把这个“虬”字拆分开来，读成“九虎”。既然大家都这么叫，于是母亲在1949年参军南下时，自己就这么报名了——“徐九虎”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但最后“名副其实”——我母亲一生导演话剧六十余部，成了著名女导演，受人景仰，不可谓不“威猛”。然而翻看了母亲所有的遗物，居然找不到一篇专门为她采写谈其生平与成就的文章，这也说明她不可谓不低调。她笔记本里夹带有一封1985年署名陈某某的记者来信，这一年正隆重举办“首届重庆雾季艺术节”，我母亲导演的曹禺话剧《蜕变》建国后第一次在全国公演，影响巨大，于是记

者与母亲约定，要为她采写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已经拟好《虎老威犹在——访〈蜕变〉导演徐九虎》，但是最后为什么没有采访和写出，我不得而知。

于是，我只能根据我的经历和感受，依据母亲留下的一些信件和笔记文字，来追忆我母亲的一生，尽可能全面地还原我母亲徐九虎真实的人生。

母亲与儿女

“虎毒不食子”是说老虎虽然威猛狠毒但不吞食自己的孩子，在人们心中它仍然是一种对子女充满爱心的动物。但是，在我童年时母亲抛弃了我三次，而且在抚育三个儿女时，给予的关爱太少，费心太少，以至于我回忆童年的历历往事时，不仅痛苦，而且“痛恨”。

她也知道我的这种“痛恨”，但她一直没有对我说过愧疚的话语，没有乞求过我原谅。母亲最后的岁月是由我陪伴的，1998年，她去世前的一个月躺在床上和我聊了很多，她说：“巧巧，难道你真要怨恨记仇你妈一辈子？”我想了想说：“我早已不怨您了，但我不会忘记您在我幼年时三次抛弃我的痛苦经历。”她抚摸着我的手，认可似地默默点了点头，朝我笑了笑。那意思是说：“妈能理解，能宽恕就好！”

我被母亲抛弃的三次时间是：1944年，我1岁不到；1949年，我5岁时；1954年，我11岁时。想想看，一个小女孩在童年时3次被送人寄养，找不着妈妈，那心灵能没有创伤吗？

我对几次被抛弃的回忆是恐怖的。第一次被抛弃，是父母从桂林返渝后为了参加北碚教育部巡回演出队，剧团不允许带孩子，母亲就把我托付给姨妈寄养。姨妈家已有几个孩子，再加上我，孩子太多，姨妈只好把我放在南岸一户农民家中，不再来看我。那年月，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据我一个堂兄回忆，当他们几个月后在农民家找到我时，我营养严重不足，已“大腹便便”得了“大肚子病”（腹水超多），拖着三条腿（严重脱肛及肛裂），还满身疮疖，已不成人形。他们赶快接我回来医治，当时家中也无钱，只能靠每天多用清水洗几次，并放在屋檐下晒太阳进行消毒，才慢慢好起来了。我母亲后来回忆起当时她见到我肚皮比脑袋大两三倍时，泪流满面，深感歉疚。

第二次被抛弃时，我5岁多，基本记事儿了。那年我父亲刚去世不久，我住在无锡祖母家。7月，我妈已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欲进军西南。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是如何分离的：那天上午，我追着她，她实在无法脱身，只得笑盈盈地对我说：“你回屋去看看奶奶的中午饭烧好没有？”我哪里知道这是母女的分别？就屁颠屁颠回屋去了。我看到饭还没烧好，赶紧出门来想回妈妈话，但哪里还能找到她的身影啊？我哭天喊地，没有应答，“狠心”的妈妈，就这样把我们第二次“抛弃”了……

我只能和一个堂姐一个表姐一起在祖母处相依为命。1950年过春节，本来是锣鼓吹打欢天喜地的，地上放着一根人家“卖年货”的扁担，我一个小女孩不知就里地从扁担上跨了过去，这一下惹大祸了，因为封建习俗里，认为女孩如果跨过扁担，就一定会把阴暗的晦气附带过来，对物件主人是大不吉利的。于是人们就拼命地追打我，而我只能惊恐地逃命。后来我的家人向人家赔礼道歉都不行，只好将我痛打以给人家出气。这时候我最想的就是找妈妈庇护，可哪里找得到啊？这事儿深深地镌刻在我童年痛苦的记忆里磨灭不去。

母亲南下到重庆两三年后，1951年我们3个孩子高高兴兴地从无锡被接到重庆。

可好景不长，1954年，母亲被组织上送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培训班进修，一去3年。我们3个孩子，说是托交剧团代管，无异于放任自流、独立生活。

1955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弟弟庆吉与一群小伙伴在红旗剧场的舞台上“藏猫猫”闹着玩儿，别家一个小伙伴不小心把一只后台转角地灯踢碎了，孩子们见惹了祸一哄而散，听到声音追出来的工作人员封某，一个也没逮着。本来这事与我们三兄妹无关，但就是因为没有父母的庇护，当天晚上封某找到我们家，看见正在制作幻灯的大哥林吉一人呆在屋里，不问青红皂白，认定是我大哥闯的祸，二话不说，揪住他就拖了出去，将他反锁在服装间里。当晚我和弟弟庆吉回家后不见哥哥就外出找他，但直到第三天（星期二）的下午，因为有演出，管理服装的张淑珍阿姨开门拿服装，才发现大哥林吉在服装间里被关了两天两夜，水米未进，已经蜷缩在角落里昏睡不醒。原来封某当天晚上把大哥揪到服装室拷问踢碎地灯的事儿，大哥根本就没有参与甚至不知道此事，当然不会承认是自己踢碎了地灯。封某反觉得是我大哥不老实，就顺手将大哥反锁在服装室了，第二天他居然把关人这件事忘了，可苦了我大哥这么一个老老实实的孩子，没吃没喝地被关了两天两夜。这事彻底激怒了我，于是我约了几个也是职工子女的平时玩伴一起大闹摄影棚，找封某打了一架。当时文工团的职工们都不来谈事情的是非曲直，只是一味地指责我蛮不讲理，直到文工团团长李庆昇叔叔从外地出差回来听说后才来过问此事，之后是李庆昇叔叔代表单位致歉并以个人的名义请我们三人吃了一顿饺子才算平息了事。从此以后，文工团中戏称我们三兄妹为“三头凶龙”，这让我们百口莫辩。当时我们是多么需要妈妈的庇护，可她却三年都不在我们身边。

母亲1954年去北京学习时曾和团里沟通过，说我们三兄妹年龄尚小，由团里负责保管我家的衣物、书籍等物品。但我们的衣物却时常不明不白地丢失，我们也只有自认倒霉。有一天放学回家，意外认出我们的衣服穿在团里勤杂工陈某的孩子身上，我去文工团理论此事，却无人理会。之后又发现过几次，又去理论，却说我们无理取闹。直到两三年后，陈某因偷窃团里的演出服装拿出去卖被派出所当场抓获，因此被文工团开除，但也没有说清他曾经偷拿过我们的衣服。直到1956年母亲学习回来后，亲自去团部询问，才答复她是陈某偷走了我们的衣物和书籍。想想那些妈妈不在的日子，我们有怨可去跟谁诉？

1956年，母亲进修期满返回重庆话剧团，本以为我们可以从此得到母亲的爱抚，实际情况却是她一头扎进剧目导演、演员培养等业务工作中，整天就是排戏、教学，教学、排戏，更没有时间来照料我们了。这以后关于家庭事务，妈妈什么都不管：每月妈妈的工资由大哥领取，由我们把握开支。发薪后，我们先替母亲把她需要的香烟、茶叶买好，然后为她买好加班夜宵的点心，放入饼干盒里，最后才去买饭票菜票、交学费、买课本。平常我们上学、妈妈上班，我们放学回家赶紧买饭或弄菜，妈妈回家肯定比我们晚。我们有事要找母亲，或者母亲有事要找我们，大都是写个纸条放在桌上，互相看到纸条后酌情处理，相互间基本上没有见面和说话的机会。妈妈将她的全部情感和精力都倾注于她的话剧事业中了。

大哥林吉1960年从科技校毕业出来，就到九龙坡火力发电厂锅炉运转车间当铲煤工，一天8小时不停地为锅炉添煤加火，工作太过劳累单调。1962年征兵开始，大哥就参军走了。

1965年11月9日，我哥在部队换防时发生意外死亡，还不满25岁。当时话剧团正在倾全力排演《劳动万岁》，妈妈担任导演并参与剧本的创作，忙得不可开交。噩耗是部队以电报方式发给话剧团党支部的，支部经过研究，为了保证剧目的顺利排演，决定先派两名同志到部队全权处理大哥林吉的后事，将此凶讯压下来，待剧目上演后再告知妈妈。母亲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继续排演，其间我和弟弟庆吉给大哥寄出的信都被退回，我们以为地址有误，于是纷纷写信给妈妈讨要大哥的最新邮寄地址，妈妈也无暇回复。到了年底，戏排完开始公演了，妈妈向组织请假，要求到部队去看望大哥。直到这时，时任文化局局长的李庆昇叔叔带了两个医护人员一道，亲自向妈妈讲述了哥哥已经意外死亡

的实情。妈妈当时就整个人僵在那里，没有熄灭的烟蒂烧到她的手她都木然不觉。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妈妈深度昏迷不醒，滴水不进，只能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可以想见，这件事对妈妈的打击是多么的巨大！话剧团通知打通煤矿转告我，要求我立刻回家，矿上破天荒地派小车把我送了回来，我回家照顾了妈妈半个多月。

1961年，我初中尚未毕业，政府有文件要求大龄中学生到农村，我当时已18岁属于大龄，被安排下农村到南岸赵家沟生产队。后国家要求调整充实提高经济，又集体调回到重庆饮食服务公司从事收银工作。1962年6月，妈妈因为工作劳累、营养不足，引发了黄胆型肝炎，因为这是烈性传染病才不得不住院治疗，后病情迅速发展为“肝昏迷”，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持续达三个月之久。我因为要照顾病中的妈妈，只能辞职回家。

1963年元月妈妈才康复出院，我却只能在家待业。一次母亲在与同事就工作事情激烈争论时，同事的家属话中有话地咕哝了一句，说我们家里还养“大小姐”。要知道那个时代社会上对不参加工作是十分鄙夷的，“大小姐”是资产阶级不劳而获只知享乐女孩的称谓。我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污辱？于是马上去街道办事处要求安排工作。岂料街道负责分配工作的经办人与话剧团有隙，趁机将我这个话剧团子女分配到边远地区的綦江县打通煤矿。在那里我干了10年的重体力活，每一天都是抬“连二石”、水泥、石子、河沙、土方等，甚至64人的“连杆大抬”都要去，与最劳苦的男职工活路无异，虽然为此被采访被颂扬，但实在是咬着牙受苦受累，我坚持了整整十年。事后那位分配工作的干部曾经后悔地对我说：“我若早知道你是徐九虎女儿，决不会这么做。”可见他虽与话剧团有隙却对母亲很敬重。

1973年，有“落实政策”的文件说身边无人照顾的老干部可以将子女调回来一个，但不安排工作。我让母亲为我通关系找工作，但我妈却不吱声。我也曾经嘲弄过母亲：“你连女儿也解放不了，还解放全人类呢？！”后来还是大哥原单位党委书记帮忙，替我联系调到重庆印制一厂当排字工，重新开始学习排字工作，直到我1993年50岁退休。

在我想来，我母亲本来也是可以利用她事业成就建立起来的威望和影响，为自己的儿女谋划一下的，然而她没有这样作。人们可以说她是“高风亮节”，但作为她的子女，我们“记恨”母亲的“不作为”！尽管在她临终前我们宽恕了这一切……

母亲的人生轨迹

我母亲人生轨迹的前三十年大致可以这样简单描述：她1920年5月6日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后来听我台湾返大陆探亲的一个舅舅说，当年祖上是前清官家，家族庭院门前还有下马礅什么的）。12岁被二姐带到安庆读书；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后，她随哥哥姐姐流亡，先去汉口，后来重庆；1938年在重庆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同年12月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随国立剧专搬迁四川江安县继续读书。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遵照党的指示离校转移，后与党失去联系。奔走重庆，流亡桂林，其间与国立剧专学长叶燕荪结婚。与丈夫在桂林三联书社、广西国防艺术社、新中国剧社等处工作三年。1942年大儿子叶林吉在桂林出生。1943年女儿叶巧明出生在桂林。1944年秋湘桂撤退，再次怀孕的母亲徒步返回重庆，为了参加北碚教育部巡回演出队的工作，被要求不准带孩子和爱人，即把我送南岸农村寄养。1945年小儿子叶庆吉出生在重庆北碚。抗战胜利后，她即随丈夫回到江苏无锡，先后在无锡太湖剧艺社、无锡师范学校作导演，后在无锡市崇安寺小学当音乐教师。我父亲1949年2月2日（大年初五）因病去世。1949年7月母亲再次将3个年幼的子女（4岁、5岁、7岁）分别托付给无锡的亲友（林吉和我请友人刘厚生叔叔托付给我亲戚家安置，庆吉

安置在西南服务团王益奋叔叔的母亲处)，自己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进军西南，来到重庆，后在重庆市话剧团任导演。1951年将3个孩子从无锡接到重庆，家人始得团圆……

翻看手中母亲留下的信件和资料，我可以整理勾画出母亲当年参加地下党、从事进步宣传活动、其后被迫撤离与党失去联系、艰难找党、回到党的怀抱的全过程，可以说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1982年，母亲在重庆市文化艺术工作先代会发言材料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右图：徐九虎年青时留影）



1973年组织上决定我导演一个新剧目，全团同志满怀革命热情，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了排练工作，演出后得到广大工农兵观众的好评。我们决心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把戏送到万盛去演出。但是我团的帮派骨干却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攻击这是“以生产压革命”，不顾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贫下中农希望多演几场的要求，不顾我团党员和一些老同志的劝阻，竟公开大闹罢演，制造了我团解放二十几年来从未发生过的停演事件，引起了全团同志的无比愤慨。为了提高演出质量，让老演员在演出上做好传、帮、带，我在几个戏中向党组织推荐了几位老演员担任重要角色，这就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说我是“导演专政的阴魂不散”，“文艺黑线回潮”、是“翻案”、“复辟”。1971年我接受培训第四班学员的教学任务。在培训中，我按照党对培养人才的要求，要求学员又红又专，要努力学习业务，为人民服务，这又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给我横加上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是“修正主义苗子”等罪名，疯狂地发泄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不满。我没有管他们那一套，你点名也好，批判也罢，我只跟党走，该导演我就导演，该教学我就教学。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四害横行的1976年，“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妄想篡党夺权达到疯狂的程度，文艺界帮派骨干，把我团廖荣华同志打成反革命分子之后，在我团制造白色恐怖，利用各种卑劣手段，妄图打击陷害大批党内外革命同志，把反对他们的革命同志打成“保邓势力”、“右倾势力”、“支部的走狗”、“秤砣先生”。我家里经常有些同志来谈心，他们就攻击我的家是“反革命黑窝子”，恶毒咒骂我是“教唆犯”、“毒害了四代人”，帽子棍子一齐来，这真是打不死你、压不垮你、气也要气死你。他们要搞得有戏导不成，演不成，有学也教不成。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成了“反潮流英雄”，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反倒成了“罪人”。真是是非不清、人妖颠倒。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我和同志们经常守在灯下，默默相对到深夜，一声长叹接着一声长叹……

母亲笔记本里夹着这样一张纸条，那是她在“文革”中最痛苦时期，为自己撰写的一幅对联，表达了当时的心境——

风声雨声不吱声 了此一生

国事大事不问事 平安无事

那种悲切，那种无奈，在这幅对联中透露无遗。

这幅对联前后拟了两次，两次文字稍有变化，但文字意境却完全不同——

风声雨声悲叹声 枉此一生

那种自责，那种警醒，在修改的对联中跃然纸上，让今天看到这段文字的我们怦然心跳、热血沸腾。

我母亲对重庆市话剧界最大的贡献应该有两个：其一是导演了40余部话剧（加之解放前和给业余剧团导演的总共60余部）奉献给社会，其中不乏精品；其二是培养了4个班数十个话剧新演员，建树话剧演员队伍，其中不乏艺术骨干。

母亲1958年开办第一期话剧学员班的时候，她才38岁。她担任班主任和主课老师，言传身教，呕心沥血，不是母亲，胜似母亲，受到全体学员的爱戴和尊敬。“文革”前三期学员班办下来，为重庆市话剧团培养了40多个话剧新演员，成就了话剧团的演员队伍。难怪她得到这样一句对联——“三十几岁的妈妈，四十多个孩子”，横批是“慈母严师”。这是陈飞叔叔为她写的，大家都说写得恰如其分。

加上1971年招收、1989年补课的第四期学员班，母亲培养的话剧演员，应该在60人左右，毋庸置疑，这的确是她一生除导演工作外的另一大成就。

1999年冬天，在母亲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当年培养的学生刘清运专门联系母亲曾经培育的第四期学员数十人，召开了一个茶话会，共同回顾徐九虎老师对他们的师恩教诲。在母亲慈祥的遗像左右，是一幅表达后辈们心声的挽联——

九州剧苑同悲悼 痛失巾帼名导

四代弟子共追思 难得慈母恩师

虎老威犹在

50年来，母亲先后导演和参与演出了中外话剧《红旗歌》、《思想问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妇女代表》、《种桔的人们》、《归来》、《达尼亚》、《夜店》、《天国春秋》、《异路人》、《青春之歌》、《是谁之过》、《刘介梅》、《布谷鸟又叫了》、《烈火红心》、《决裂》、《上游颂》、《手风琴之歌》、《灯火》、《八一风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地下少先队》、《红日照山城》、《最后一幕》、《以革命的名义》、《伊索》、《革命的一家》、《雾重庆》、《小红军》、《雷锋》、《霓虹灯下的哨兵》、《李双双》、《苦水甘泉》、《劳动万岁》、《夜海战歌》、《槐树庄》、《艳阳天》、《春风送暖》、《风华正茂》、《山村新人》、《万水千山》、《战斗的航程》、《陈毅出山》、《西安事变》、《屋外有暖流》、《回来吧！野妞》、《护照的秘密》、《蜕变》、《酒干倘卖无》、《寒冷的夏天》、《救救她》、《猎狼》、《快乐的单身汉》等60余部。其中60年代导演的《雾重庆》连演百场而不衰；90年代再度排演，参加西南话剧会演，获最佳导演奖；1991年荣获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颁发的第二届中国话剧金狮奖。1985年导演的话剧《蜕变》，是解放后改编及导演该剧的第一人，得到了曹禺的认可。

这里，有必要特别说一说曹禺的《蜕变》，母亲是解放后改编及导演该剧的第一人。因为这部作品的构思、创作和首演，都与当年国立剧专包括母亲在内的他们这批地下党学生的地下活动有关，在他们心底，《蜕变》是一出特别的作品。

当年的地下党剧专支部书记、后北京人艺导演、解放后导演该剧的第二人方瑄德回忆了这个剧最早在重庆演出的情况——

剧专这次的演出，受到重庆各方面隆重的接待。但最引起各方面注意的而是《蜕变》的演出。首先，国民党中宣部张道藩、潘公展审查了剧本，立刻叫修改，并由潘公展亲自修改了送来，叫按照他们修改的上演。他们把剧本改成为国家至上、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领袖的反动内容。这样曹禺表示坚决不接受，演员也坚决不演。最后，为了争取《蜕变》能够在重庆演出，我们也作了一些让步，删去了一些直接骂国民党的台词。当初次上演时，潘公展亲自拿着剧本对照台上的台词审查。我们演员就一定还是按照原来的台词说，对我们这样演，观众非常激动，大为欢迎。气得潘公展严厉地质问学校为什么演员不按照他们改的演。学校问到演员，我们就说上了台改不过来，只会照排好的台词演。潘公展坚持下一场演出一定要改，学校只好答应了。可是一上台演员们又回到原来的台词。这样潘公展天天来、天天生气。而重庆各报，尤其是《新华日报》、《新蜀报》、《新民报》等每天都有文章为《蜕变》叫好。这样不久胜利结束了重庆的演出。《蜕变》就成了抗战开始曹禺第一部抗战戏剧流传于世，我们支部是尽可能的保证了这个戏的演出。

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重庆举办“首届雾季艺术节”，我母亲决定要把《蜕变》这个戏重新排演。经历“文革”十年动乱后，母亲感触很多，她在此戏《导演阐述》里关于女主角丁大夫的一段文字，应该也可以看着是她重排此戏的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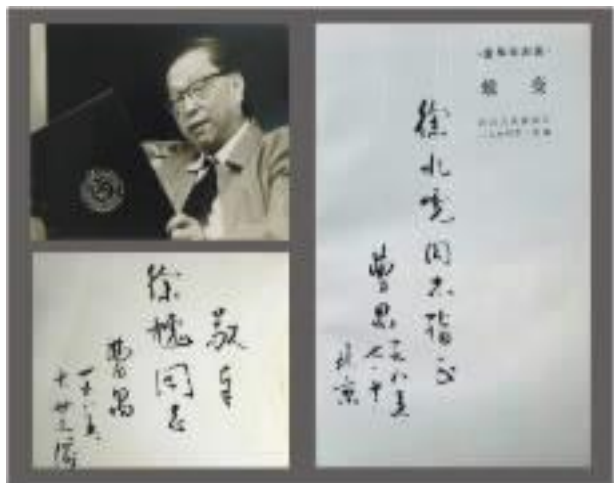
这是作者热情不可抑制的作品，极强的内心视觉能力，凭借内心的视力来看待所描写的对象。丁大夫充满人道主义的崇高牺牲精神，索取极少而献出很多，当国家面临浩劫之时，妇女承受最多的苦难，作出最大的牺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可贵的传统，我们的周总理曾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丁大夫就是我们东方人赞美的母亲形象。”

这样的母亲形象，正是她有意推崇、效仿和歌颂的。

作为《蜕变》的导演，她感到兴奋和担忧兼而有之。说兴奋，是因为曹老是她的老师，是因为她曾经在烽火年代演出过这个戏，是因为目睹过观众如何喜欢它。特别是因为这个戏曾经有争议而搁置多年，能够由自己亲手排导出来，恢复它的灿烂光彩，这是多么光荣的责任啊！说担忧，是考虑到《蜕变》系曹老名著，要排导出相应的水平，自己办得到吗？另外，曹老这个剧，光阅读就要4个小时，时间太长也是个问题，非改不可，自己又能否改好呢？

为此，她亲自专程去北京邀请曹禺先生，受到他热情接待。她的这些顾虑以后都由于曹老的鼓励和支持完全打消了。曹禺老师亲切告诉她：大胆改，一定会改好的。考虑到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曹老还说，要想法打破话剧“三面墙”，一定得打破。

我母亲终于把4个小时的话剧压缩到2小时，成功地把它重新排演。曹禺、刘厚生等一大批来渝观摩的戏剧专家对此戏给予极高的评价。曹禺先生将他的剧本和照片题赠给我母亲，手书“敬奉徐毓同志，曹禺，一九八五.十.二十三日.渝”，表示对他得意学生的肯定和感谢。



可是，那一阶段，中国话剧市场极不景气，团里的情况不太理想，一连几个戏，卖座都不好，赶排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卖座能否好转也无把握，真有“不知今后如何”的感叹。戏剧面临两种对手，一是电视、电影，戏剧界成了它们的“荇头店”，大批人才流失；二是港台流行歌曲，风靡在青少年当中。可贵的是，我母亲敢于迎接挑战，1986年，她赶排了一出台湾题材的大戏《酒干倘卖嘸》。为了吸引和争取青年观众，她在导演的手法上作了大胆探索，力求手法多样化，把音乐、舞蹈、电影的蒙太奇“定格”和舞台艺术中“对立”的写实、

写意等各种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为“我”所用，糅合一起，力争出新，结果大获成功。观众和同行看了演出的评价是：“完整、和谐、淡雅、新颖”。这对于一个老导演来说，太不容易了！《酒干倘卖嘞》连演 150 场不衰，创话剧团单戏上座率的新高峰。

母亲 1988 年离休，但她离休后继续为团里导演话剧，并连续参加了几次西南地区和大片区的话剧调演，成果丰硕。

1990 年首届西南地区话剧节，荣获老艺术家青松奖、优秀导演奖。

1991 年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颁发的第二届中国话剧金狮奖——中国话剧导演金狮奖。

1991 年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授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工作、具有突出贡献的巴渝文学艺术奖”……

这些奖状和奖杯，如今都陈列在我的卧室里。我单独为它们设计制作了一个两米高的三层角柜来展示，日夜陪伴着我。

大爱无言

母亲于 1998 年 12 月 13 日逝世，享年 79 岁。

母亲去世后，我整理母亲的日记，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充满无尽的爱：

1996 年 1 月 21 日 （下图：徐九虎大儿子参军时，与家人合影）

今天是林吉的生日，要在的话，54 岁了，走了卅一年了。不知为什么，最近夜里睡不着，总想到他。他要在的话，在科技方面肯定有所作为的，他总是默默地埋头实干。想当年他被学校保送上高中时，他一点消息也不透露，直到升学考试那天，我见他没去考试，他才说已被学校保送。我半信半疑，到学校去证实，这孩子就是默默地不作声。对学校布置的作业，那是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我从不费神、操心……当时我经济不宽裕，买个闹钟都不可能，他一夜起来几次，跑到收发室看时间，深怕耽误了上学。可学习是相当钻研，对他，我总深深地感到内疚，他走得太早太早了！要不然在科技方面，对党对国家会有很大贡献的。……科技校下

29



马，组织安排他到发电厂，他服从了分配，但毫无兴趣，想调工作没有成功。参军，多少有点赌气，尽管我了解他的心意，但我无法解决他的工作，只好让他去了。到部队，情绪好多了，还立了三等功，并要解决入党的事，我也放心多了。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然传来了他离开了人世的噩耗，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了。我真的无法接受，我不相信。他随便到哪里去，总要给我留条子，可为什么这次不给我留条子？！为什么？！为什么？！我至今都想不通。我的林吉，你太狠心了点

嘛，就这么走了，一走就是 31 年……记得有一次，我正在连夜准备《最后一幕》的导演材料，你从学校支农回来，已是半夜，你要洗脚，我摸你的脚，冰冷冰冷，我糊里糊涂拿起开水就往你脚上加水，立刻你脚上起了泡。

我打自己的脑袋，怎么那么不清醒，你忍着痛说“没有什么”。第二天背着你到外科医院，还算好那时你新陈代谢的能力强，没几天就好了，可你脚的情景经常出现，总是那么清晰。可是人呢，不在了……

字里行间，处处透着母亲对哥哥林吉的怜爱和痛失爱子的悔恨。

渐渐地，记忆里母亲对我们的那些点滴的爱，浮现脑海……

那是 1972 年 5 月 1 日，我在矿上出事故，从 30 多米的山上一路摔到了山脚，全身缝了 20 多针。当时妈妈导演的《槐树庄》刚上演几天，1 号晚上母亲知道我出事了，她尽管还没有从劳累中恢复过来，第二天一早就先坐轮渡、再坐汽车、又是火车地来到了矿上，再接着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赶到我的工作点来看我，并向我的领导替我请假。然后又连夜与我一起乘车回重庆，3 号一早又陪我到医院去看病，下午又赶到位于万盛的剧场参加演出……几十个小时的连轴转，一路风尘仆仆和劳累，饱含母亲对我的爱。

那是 1951 年 9 月刚开学，弟弟庆吉在位于枣子岚垭的重庆小学里玩耍，不小心将小腿骨折了，学校只好打电话通知母亲。妈妈当时正处在导演《保尔·柯察金》的关键时候，她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急匆匆地赶到学校，看到弟弟庆吉的腿肿得厉害下不得地，不顾自己肺结核还没彻底好完医生要求不要过度劳累的嘱咐，立即背着弟弟步行到中一路的中山医院去就诊。妈妈背着弟弟，一会儿去挂号，一会儿去就医，一会儿去照片，一会儿去打石膏。忙完这些，一看马上就该到下午的排练时间了，妈妈又赶紧将弟弟庆吉背回市文工团，放在排练厅隔壁的平台上，汗也来不及擦一把，又立即投入到下午的排练中。从枣子岚垭到金刚塔坡上市文工团的八百多步石梯、土梯全是上坡，而且高低不平，弟弟庆吉趴在妈妈柔弱的身体上，妈妈又怕走路太快把弟弟颠疼，她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上去的？！这正是母亲对弟弟庆吉的爱。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论是对我们三兄妹，还是对我们的孩子，母亲总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中洋溢着对子女伟大的母爱。

……

1998 年 12 月 15 日，“为导演徐九虎同志送行”仪式在重庆殡仪馆隆重举行。

在母亲的追悼会上，人们对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那天让我最为震撼的，却是我弟弟庆吉代表我们子女告别母亲说的一番话。他说——“母亲啊！你幼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为什么人间最大的苦难都让你一个人承受啊……”

真的，那一刻，我有一种惊讶！更有一种惊醒！原来母亲真的是在承受人间最大的苦难！而她，却是在这样巨大的苦难中创造了事业的成功，完成了人生的升华！

殡仪馆满是鲜花，满是花圈，满是人影。母亲遗像的两旁，高悬着挽联——

曹禹高足 徐虢伟业垂千秋

巾帼英雄 九虎精神照后人

这是人们对母亲的真实评价！

母亲无愧于人们的对她的评价！

妈妈，我们想您！

妈妈，我们爱您！

我不再上访了

雷润泽

我是共产党活着的烈士。我原先认为，只要共产党不垮台，我受到的诬陷与压制一定能得到洗刷、昭雪。但是我错了！我二十七年来穷尽一切办法，现在终于明白，即使共产党不垮台，我的问题也弄不清楚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经手处理我历史问题的那些“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曾经信仰、追求、并甘愿为之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了。

我为什么要上访

一，我的地下工作经历

一九四七年旧历十月我初中毕业，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马一中（文革自杀前是成都体育学院教导处长）先生把我叫到他寝室问我道：“毕业以后做啥子？”我回答说：“升学。”他想了想，动员我说：“天要亮了。天亮了读书，打倒蒋介石读书。”后由刘云柯（解放后不知道下落）先生指点我到郑多恒（病逝前在四川省科委工作）先生家，认识了后来的特支书记彭立人（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渣滓洞）。从此，我就在彭立人同志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了。

我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在一九四八年川东龙潭暴动前夕，我领导的组织就发展到四十多人了（见中共达县 1919—1949 党史 268 页）。龙潭暴动中，我带上山参加暴动的有李春界、郭荣先、程代安、何华生和李胜极，加上我共六人。由李春界发展的李代荣，因家在木子乡，关系由特支委员郑多恒先生联系。一九九五年为彭立人烈士立传时、当时健在的唯一特支委员郑多炳（已逝世）说，李代荣也带人上山了，郑还说李代荣是党员。李代荣解放后参加渡市区工作，曾担任渡市区区长的刘德炳在会上也证实李代荣是党员。我于是气愤地质问郑多炳说：“李代荣是李春界发展的，李代荣是党员，李春界是不是党员？身为特支委员，八三年落实地下党政策你为什么不肯为李春界出证明？”在与会的众多目光注视下虽然把郑多炳的脸羞红了，我却没有问李代荣带了多少人上山（现在只有刘德炳健在了，听说刘在重庆一个中医研究所离休，可以为会上的情况作证明）。倘若李代荣也带了两个人上山参加暴动，我发展和领导的组织中至少有九个人上山参加龙潭暴动。

暴动失败我被捕了。

第一次审讯我的是伪县警察局督察长龚渊如。尽管我被反剪双手，我还是在他的法庭上走去走来，没一句口供。他拍着桌子厉声喝道：“我是审问你的官哪！”并命令左右拿来绳子杠子。绳子杠子像死蛇一样摆在我面前，我还是没有口供。后来听说他向伪县兵役科科长说，他所以没有用刑，是因为受了我家款待，还承认接受我家贿赂，抹不下脸（健在的程代安可以为这事作证明，程代安现在都江堰干休二所）。

我在反动派的监狱里关了十五个月。

入狱不到一个月，我就打了看守。看守名刘有志，只感觉他对犯人太残暴，太凶恶，该打。没有想到打不得，也没有想到我打不得赢他。他至少二十岁，我十六岁，并且我脚上还戴着脚镣。我把他打懵了，他没有料到犯人敢打看守，当他意识到要还手时，放风前的犯人们喊叫起来了，后来只得由老犯出面给我戴上反手铐把我关进黑卡。在一些犯人的周旋中看守主任同意叫我写份悔过书，认个错算了。我拒不认错。看守们为了发泄和报复，找了绳子竹块准备在晚上犯人收风后收拾我。一个同看守住一起有七年徒刑的肖姓伪军法官开导他们说：“算了算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共产党的脑壳上又没有刻字，那样小一个娃儿都敢打你，整了他们，城里尿巷子尿巷子多得很，如果哪里碰着哪里

‘发财’，不是自讨苦吃吗？”看守们害怕了，停止行动，把我从黑卡放出来，第二天又由刘有志亲自下了我的反手铐。

监狱的不平事太多。犯人住的房间叫仓，睡的床叫“筏子”，由睡筏子下到睡筏子上，由大仓到小仓，都离不了钱，穷人哪来钱呢？并且睡筏子下以前还要先睡尿桶旁边，醒来一头一脸都是尿水。……我用这些材料写成散文或小说通过荣承烈（荣同情地下党，他弟弟荣世政当时就关在重庆渣滓洞），发表在《达县日报》上。不知哪一篇惊动了县参议会，专、县法院受到抨弹，监狱当局进行大搜查。几百犯人原地不动，上自看守所长，下至全体看守，一个个全神贯注，如临大敌，以致遍地乱草，满仓狼藉。但我没有因此搁笔，一直写到我们被解到万县为止（未发表的文稿解万县时交荣承烈保管）。

我还两次组织劫狱，计划了出狱后的游击活动。

一次是由我家出钱，疏通法院，批准曾庆辉（开江普安场人）提前假释；一次由刘定国（也是开江普安场人）借外出挑水的机会逃跑。出狱后找来存放在外面的手枪，里应外合。第一次我家在筹钱时我染春瘟，误了时日；第二次刚安排就绪，我们又突然被解往万县。

上面三项，除同时被关在监狱的周代盛（离休干部，现住达县双庙乡）和程代安可以证明外，八三年县委在落实地下党政策时也查证属实作了肯定：在狱中打过看守，写过进步文章，组织过劫狱（实际情况岂一个“过”字了得！——查县委组织部档案）。

后来发生的事使我在人间地狱生活大半辈子……

在龚渊如拒绝接受我家贿赂愤然离开后，我母亲痛哭流涕批评我把事情弄糟了，我骂走我母亲。我经过批准参加了亲帮，我亲帮师父龚君楷来看我，他向我说：“你这个娃儿英雄，龚渊如是啥子人，你都敢公然反抗，了不起。”当时在我幼稚的心灵中我确实认为我是英雄，听了他的话感觉乐滋滋的。他教导我说：“你现在被他们抓着了，光‘硬’有啥用？说几句‘耙’话，（释）放了你又来（干革命）嘛。”

老师们只教我读书，激发我对蒋介石政府的愤慨；特支书记彭立人只教我如何工作，却很少提到被捕后如何对待敌人。解放后郑多恒先生从云阳给我写信来说：听说你被捕了，我心中深感不安。你小小年纪，如何去适应那瞬息万变的环境？如何去面对那凶恶残暴的敌人？

正如郑先生所说，我十六岁，我竟认为龚君楷的意见是正确的。暴动已经失败了，人也都走了，关键是放了我又干革命。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半推半就地在父母托人写的“悔过书”上盖了指纹（悔过书内容：年幼无知，受奸人诱惑，误入歧途……没涉及暴动一个字）。后来在敌人法庭上因我是暴动失败被捕的，向敌人供认了部分暴动情况。

在被关押在伪县警察局的日子，因夜晚无眠，我心中多次向幽冥中呼唤：彭立人同志到哪里去了？老师们又到哪里去了？我现在的态度“对头”吗？除传来小礼堂自鸣钟钟摆的嘀嗒声外，无任何回应。倘有人提醒我说现在的做法错了，从我在监狱的全部表现看我会立马“改变”过来的。——可是没有这样一个人啊！

尽管敌人不相信我的交待，后来对我使用了电刑，我在敌人法庭上像死人一样没有出卖一个同志，也挽救不了我向敌人供认部分暴动情况的过失，铸就我一生悲惨的命运。

二，解放后的遭遇

我们的特支书记彭立人解放前夕在重庆渣滓洞牺牲了，达县地下党属川东，达县解放后的行政区划在川北，达县没有清党，除四个没有脱离组织关系的党员外，我们的情况无法向组织全面反映并得到信任，如同一群被遗弃的孤儿。

一九五六年审干，县委认为中央十人小组政策规定，凡是在敌人法庭上出卖了组织活动情况的都是叛徒。我被捕后向敌人供认的暴动情况也属于组织活动情况，我应该定为叛徒。

县委还认为向敌人供认暴动情况是贪生怕死。

我不同意县委的意见，因暴动失败后，暴动情况已经完全公开了，我不交待敌人也清楚；况且还应该全面地、历史地考虑我被捕后的情况。……但不管我如何申辩，县委的意见始终没有改变。

我把我的全部情况（包括在悔过书上盖指纹）写成材料，附上县委的意见和我的意见，请县委审查后转呈省委认定，我听省委的。县委没有上报这个材料。

一九五七年整风，县委说县委是代表“党”的，我拒不承认县委历史结论就是反党，划我右派。划了右派我也不接受县委的历史结论，就开除我送劳动教养，还以反革命罪由法庭判了我三年管制。

一九六一年底解除劳教遣送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一个有“地主”、“叛徒”、“右派”身份的人，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活下来有多么困难！幸好我在贯彻阶级路线之前结了婚，否则就会断子绝孙了。

一九七九年安置右派分子，我作了名普通公社干部（解放后成立县法院前县政府设司法科，我是司法科负责人；五二年怀疑我有叛变行为了，我也是麻柳区公所秘书，副区级，驻檀木三社，五四年农副业增产百分之七十三，数全县第一；三社的会计陈显福还住在达州新世纪学校，可以证明）。

一九八三年负责落实我地下党政策的是县委组织部李经荣（退休时已是县政协副主席了），在同我见面的三个月后，在渡市区委书记办公室里，有正副区委书记在场，向我宣布了三条：一，我在历史上还是有叛变行为；二，没有人证明我是党员；三，有党龄才有工龄。

一九四八年正月我和特支书记彭立人第一次在申家乡见面，他向我说你入党已经批了，五六年审干我向县委交待了我和彭立人同志谈话的全过程；八二年唯一健在的特支委员郑多炳向地、市、县委交的党员名单中有我，怎么就没有人证明我是党员呢？不是党员就没有工龄，我在解放前遭受的苦难一风吹了。并且，我在历史上还有叛变行为，我解放后的划右、劳教以及将近二十年的遣送农村也因此罪有应得了。一个落实政策的干部竟如此无知、如此浅薄，我愤慨地向李经荣说：“你还是应该读点书，把政策弄懂，你晓得啥子叫叛变行为吗？我被捕后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背叛组织，我哪来的叛变行为？”有区委书记在场，伤了李经荣的脸。

我请假到县委找主管落实地下党政策的副书记苗俊生，请求落实党籍。一个普通乡干部找县委书记说多难有多难；白天找他，他开会去了，晚上到他家里找他，因家里人不认识你，谎称不在家。我在打早饭的路上找到他，边走边谈，不到两分钟，他就厉声向我吼道：“北京成都随你去！”难道北京成都我就去不得？二十多年的积怨如火焰般喷出，我在饭堂同他吵了一架，把苗俊生也得罪了。

于是，他们不承认我党籍，也不承认我工龄，还在我的复查结论上加上我被捕后向敌人写了自白书。一个副区级干部落实地下党政策作了乡干部，工龄党籍不承认，我被敌人逮捕后没有问题也被别人怀疑有问题了。我当乡干部十三年，除去两头当了十一年县的先进工作者。后来调任十一年乡财粮，除去两头我也年年是县财政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所在财政所也年年是县的先进财政所（县委办公室和县财政局有档案可查）。尽管如此，到离休（由于我申诉，八四年底省委组织部批准了我工龄）我还是个普通乡干部。

——伪专员李放六在五三年关于“龙潭暴动”有个交待：奉重庆绥署令：将王体仁、周代盛、冉崇增、雷润泽等四人执行枪决，省保安处令将此四人交到军事法庭再讯办，故未执行（录自中共达县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华蓥东北的武装斗争》）。

——七〇年正月，省委调查组的向我说：“我们在向你了解情况前，了解你的情况都花了半个月时间，你知道反动派为什么没有杀你吗？因为你家里包袱塞得凶，给一个特务头子买件皮袍就用了一百五十块银元。”（除有档案可以查对外，当时的公社社长庞佑贤健在，能证明调查组到来的事。）

——伪县警察局督察长龚渊如也想打死我。

由伪赵家区署解县，在走出赵家不远的一个小店子门前，随行的亲帮师父龚君楷向押送的区警队班长手里塞笔钱后请求说：“长官，休息。”班长命令大家休息。我们刚在板凳上坐下，龚君楷用手把四面一指，说道：“这地方多好，四通八达。”地方确实不错，阡陌纵横，一马平川。龚君楷随即小声向班长说：“我是来收尸的，这里抬回家方便。”班长却朗声回答说：“不得打（死）了，不得打（死）了，要打（死）昨天晚上就打（死）了。督察长（指龚渊如）再三要求区长把他（指我）拉

出去打（死）了，手续由他到县政府去了结。区长没开口，区长太太向督察长跪下说：‘督察长打（死）不得呀，打（死）不得呀，那样细一个娃儿嫩条条的，贷不得他的命债呀，贷不得他的命债呀！’区长不表态，督察长只有无可奈何地走了。区长太太没有生育，担心贷了命债更不会生育。”班长的话所有人都听见的，现在只有程代安健在了，程代安可以证明。我当时不光年纪小，人不高，身体还单薄。我们被解到伪赵家区署时区长身边一个女人嘴里不断说可怜可怜的，大概就是区长太太了。

一个为共产党打天下侥幸活下来的人，在共产党获得天下后不断地受到打击和压制，能不申诉吗？

我不息诉有啥法？敢搬了石头打天？

二十七年来，我向各级党委的申诉信至少写了五百封；我十次上访省委组织部，一次上访北京中央组织部；我向省委组织部、向江总书记和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都寄过钱，请求用我的钱来落实我的问题，倘我无中生有，无理取闹，我自甘受法纪制裁，都没有结果。

二〇〇八年三月我开始把申诉交这一届县委组织部，交了多少次我记不得了，听说每次申诉县委组织部长郭莲都有批示，责成县老干部局处理。县老干部局局长谢习相也曾经把原来经办这事的魏开阔（后来是县教育局副局长）找来，有组织部的副部长柏战海在场，听了我的申诉，也听了魏开阔的介绍，像要解决问题的模样，后来不声不响，不了了之。

有一次郭莲向老干部作形势报告，散会后我问郭莲，我说：“郭部长！我的申诉啥时候能解决？”郭莲回答说：“还要调查。”我反问道：“二十多年了你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是不是你们也不敢惹苗俊生？”郭莲的脸一红，我当即说：“事情虽过去了二十多年，但经办人苗俊生和李经荣都活着，召拢来对质就把问题弄清楚了。”

我向谢习相问李经荣的下落，谢习相东支西吾。一说李经荣在青岛，一说李经荣在成都，一说李经荣在住院。总之，李经荣始终不露面。

34

怎么办？胡锦涛总书记不是说我们“依法治国”吗？我去寻求法律帮助。苗俊生李经荣固然可恶，县委组织部和县老干部局也不叫话，我打算以苗俊生和李经荣为第一被告，县委组织部和县老干部局为第二被告。我找市中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组织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听了我的申诉后建议我向组织部门申请，我想说就是组织部门不解决问题我才求法律帮助的。我找老专署那个律师事务所和法之缘律师事务所，他们要我先交钱后听申诉，我不愿意先交钱。我后来找了达渝律师事务所，律师姓陈，达县渡市乡人，我曾经在渡市当过乡干部，他不收我的钱就听我的申诉了。听完我的申诉，当我要求把县委组织部和县老干部局列为第二被告时，他笑着问我道：“你‘告’共产党吗？”

共产党又不能“告”！我没办法了。

后来峰回路转，有了希望。

二〇〇九年五、六月份某天上午，县老干部局忽然有两个干部到我家里来，不说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坐半天，走了。第二天上午又来两个干部，一个干部问我要怎样才不上访？哦！我明白了，是县老干部局害怕我上访。我回答说，“解决了问题我就不上访了。”接着，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柏战海、县老干部局长谢习相，和组织部两个青年人，连续到我家里来了四次。第一次来我不在家，第二次来谢习相向我说：“党籍不说了。”意思是查明我是党员了。第三次来还是谢习相说：“政历也不说了，已经‘改’过来了。”查实了我在被敌人逮捕后没有向敌人写过“自白书”。谢习相还说：“郭部长（指郭莲）不空，郭部长有空她还来看你。”第四次来，还是柏战海、谢习相和组织部的两个青年，谢习相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回答说：“开除苗俊生党籍。”

我为什么提出开除苗俊生党籍呢？因为这家伙太可恶了。在我向省委组织部和江总书记寄钱那个阶段，当年的特支委员郑多炳把我叫了去，郑向我说：“苗俊生到我家来几趟了，他叫你莫申诉了，问题他帮你解决就是了。”我不申诉了，解决没有问题。九一年白兰芳书记（白解放后任达县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当时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回达县，约一些老同志见面。在会上看了我的信后当即

问与会的同志道：“雷润泽究竟是不是党员？”地下党员陈耀碧（市电大校长，已逝世）回答说：“是党员。”地下党员吴万才（健在，市水利局离休干部、当时和苗俊生挨身坐在白书记对面）向苗俊生说：“雷润泽的党籍你不承认不行，他又不是年青想当官，他是想不通。”苗俊生当着白兰芳书记的面回答说：“我们马上研究，马上研究。”但苗俊生没有研究。整了别人应该受到良心谴责，他二十多年来居然没有半点歉疚表示。这种人不要说没有党性，连人性都没有，开除他党籍还是轻微的。

一次我到县老干部局去，谢习相向我说：“老革命！开除苗俊生党籍的事恐怕办不到。我们请示县委李书记（李春，县委书记），李书记说：‘人家退都退休了，给个啥处分？’我说：‘假如他杀了人，或者大肆受了贿，也因为退休就算了吗？’”

我看《半月谈》才知道，县委组织部和县老干部局所以这样着急解决我的问题，是因为中央有个“一票否决”，他们害怕一票否决。

后来风向变了，大约又不一票否决了。有谢习相，组织部的两个青年人参加（柏战海听说另调工作了，不在场），由谢习相主持，组织部的两个青年人分别发言。一个说，有七条理由证明我在解放前没有入党，另一个说我虽没有向敌人写过自白书，但在悔过书上盖了指纹，两者性质一样。

听了这些话我仿佛觉得我不是在共产党的县委组织部，是在黑社会。怎么说呢？谢习相向我说党籍不说了，政历也改过来了，两个青年人在场，没提出任何意见，曾几何时，既没有省、市组织部门的代表参加，也没有地下党人或其他退休老干部在场，翻云覆雨，出尔反尔，竟出自共产党的县委组织部，不是咄咄怪事吗？

我一怒到成都去，准备向四川省委组织部申诉，当晚住在我老师胡晓风（离休前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先生家里。胡先生奇怪地向我说：“达县县委组织部的人向我说你是党员，他们要为你落实党籍，怎么你又没有入党了呢？”我问道：“你叫他们来的？”胡先生回答说：“我认都不认识他们，怎么叫他们来呢？他们是通过我们宣传部的老干处带来的。”停了停胡先生问我：“你还是离休干部吗？”我点头。胡先生说：“既然是离休干部就算了，你在写书，回家去写书。”

回家后胡先生打电话问我道：“你想通没有？”我回答说：“想通了。”我想不通有啥办法，敢搬了石头打天？

我解放前因革命险些赔上性命，解放后也因“革命”在劳动教养修铁路的隧道里（塌方）差点命丧黄泉，苟活下来当了名普通乡干部，因没条件参加“房改”，至今除享受离休干部最低待遇外，一无所有；耿耿于怀的是在历史上还负有被捕后向敌人写了自白书的罪名。

二十七年了。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七年？我决定息诉，不再上访了。

旁观者聊教育

老赵

前不久，《新京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南科大的信息。这是一所新型的大学，那位著名学者、院士、教育家校长朱清时的办学理念是：“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去官化，去行政化”；师资从国外引进；要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譬如加州理工和洛克菲勒大学一样，办成小规模、高质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美国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六月二十九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以“正视中国的高教危机”为题撰文说：“中国高校管理官僚化，行政化，政治化，缺乏学术自由，人事制度僵化。”这和朱清时校长的办学理念是一致的。他还指出，当前中国高校的问题是：“基建已成腐败的重灾区；扩招规模过大，使毕业生就业成为社会问题；师资质量过低；学风不正，抄袭、造假丑闻不断；诚信扫

地。”这些问题也都符合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按照他的分析，中国高教改革，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进机制，打破垄断，仿效经济改革，引入外资。”

他还提出一个应该从长远考虑的问题：中国留美学生已从用奖学金念硕士转为自费读大学，而且迅速增长，现在美国已有中国留学生 10 万多人。每人每年 USD58000 元，每年此项费用就有数十亿美元流入美国。而且还会大批人才流失。提请中国领导人重视。

办学理念、问题症结、解决问题的途径都对。但是，就我这个旁观者看来，那位可敬的朱清时校长的美好理想恐怕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因为已经历时三年了，教育部还没有发给它“招生许可证”。也就是说，“上级”对他的办学方针，三年了还没有首肯。

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的艰苦环境下，西南联大给中国高教作出了榜样，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共产党建政后，照搬苏联，全国高校搞院系调整，也就是取消英美制，全盘苏化；同时开始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老教师受到严重打击和挫伤；另一方面功课学习好的不让当助教，助教都是政治条件好，功课不行的人充当，自然是后续教学力量日弱，教学水平很快降低了！

1957 年，有人提出“教授治校”，毛泽东说：“我看教授治校有道理，”结果这是个骗局，谁再提“教授治校”打谁右派。不少人中了“阳谋”之计，谁也不敢再提“教授治校”了。知识分子迅即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对象，政治运动胜过了教学任务。有权的大小官员都可以指挥别人，有学术成就的即使不挨批，也失去了所有的发言权。

大跃进时，一向大贬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又要“县县办大学”，河南曾经有过遂平一个县办了 570 所大学的世界级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竟然又发生了停课闹革命乃至完全停止招生的国际荒唐。知识分子纷纷下放劳动，几经折腾，知识分子全都“夹着尾巴作人”，谁还敢谈教学？

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了综合大学，高校才有了生命。留学之路也放开了。

然而时间一长，有些知识分子自不免忘记了历史教训。又谈起了“教授治校”。

前两年，有台湾出资，联系浙江大学牵头，要办一个高质量的法学院。办学的目标是仿效“解放前”的“北朝阳，南东吴”（所谓北朝阳，就是北平的朝阳大学，学生毕业都作了法官；南东吴则是杭州的东吴大学，毕业的学生都是律师）。浙大校长兴致勃勃，邀请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担任院长。也是说要“教授治校”。校址都初步选定了原之江大学校址。

贺卫方从北大匆匆辞职，赶赴杭州。飞机没有电话快。他到了杭州，浙大校长已接到“不批准”的通知。贺教授只好无奈地又回北大。辞了职再回来，就得去新疆石河子呆两年。这种“呆”究竟算什么性质，不得而知。

至于谈到“去官化，去行政化”，真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北京大学离休干部万耀球写的一本自传回忆录《滚爬血腥路》中谈到他父亲时说，他父亲李奇中（万随母姓）是早期黄埔毕业，和周恩来很熟。他在国民党军中作特工，共军渡长江时，他的特工、策反工作对共军迅速渡江起了很大作用。建国时，周恩来对他说：“奇中兄，现在是僧多粥少，好多人都得安排官职，你长期在那边工作，安排到实权政府部门，别人会有意见，再说需要安排（当官）的人太多，安排你在国务院，级别、待遇不低，请理解。”结果安排他作国务院参事，行政七级。

这件事说明，打下天下，就要坐天下了。大批共产党人就该当官了。事实也是如此，从五十年代初有几个非党民主党派人士当官，很快就过渡成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们一律都是中共党员。

老朽离开学校 60 年，时间太长，只记得从前大学有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大概是国民党安排了个训导长。记不起来还有哪些官。中共执政后除了校长、副校长、教务长等之外，听说又有了校党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处长，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保卫部、人事部……处长、科长……行政干部几乎超过了教学人员。

高教系统的“官化”、“行政化”从建政时就开始实行，历时 60 多年了。如今的高校非但官多，从前任教育部部长“执政”时就已经“产业化”了。再加全国贪污腐化之风吹遍了各行各业，武汉大

学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副书记龙小乐（曾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因贪污被捕，说明教育系统也非净土。尤为甚者，大学也有了自产产品——“学位”。大批高级官爷们利用官权可以交换到“研究生”、“硕士”、“博士”、“教授”、“博导”各种学位。受利益驱动，党校也掺和了进来，没念过大学的高官，党校也发给了“硕士证书”。而持有这种“硕士”证明的高官也好意思“显摆”。这也叫作“上行下效”，被判死刑的前深圳市长徐宗衡在工作期间就拿到“研究生”的假学历。另据千龙新闻网披露：河北省某县，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到乡长、派出所长的学历大都是“硕士”学位。“学位”简直成了交换“官阶”、“金钱”、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的“商品”。此外，大学都热衷于大兴土木，哪一个校园建筑得不像独立城市，吃喝玩乐设施齐全？校长大都热衷于算经济账，谁还管那学术是什么东西，大师又是何许人也；有的学校论水平不要说国际，在亚洲也排不进前10名。可头脑里就知道“狂妄”和“捞钱”，管他“真维斯”还是“假维斯”，只要是“钱维斯”就好。在几个政府官爷的鼓动下，正经教学马马虎虎，什么MBA、CEO高级总裁、执行经理、卓越领导、董事长、领袖……设立了各种赚钱的培训班之外，还办了房地产、富二代培训班，变着法儿地捞钱。几乎比其设立的系和专业的教学还下工夫。以后可能还会办起“主席书记班”，“常凯申外语高级班”和“费尔班德博士班”。反正能来钱就好。有的学校如同庄园，斯文校长，本该是知识分子表率，岂料却俨然“庄主”一个，搞了几个“教授”不时发表些惊人谬论，哗众取宠。养了一批家丁，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欺凌弱者。自己不学无术，醉心“孔方兄”，四处捞钱，还不耻向香港巨富乞怜。近日又笑脸瞄住了什么“企业家俱乐部”，炫耀其办学捞钱的政绩。这也算知识分子？这也叫办学？他就没有看到他每年高考招到的“高中尖子生”逐年在减少！

学校是门坎高，进门难，只要考进了大学，学习好坏就无所谓了；学生一进校门就为找工作奔忙！谁考虑过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学校越合并越大，越大“校领导”越能从副部级提到正部级，招生越多越能提高“政绩”。

今年，亚洲100所大学评比的结果显示：港科大第一。北大仅列名13，清华为15。而中国审计署科研所副所长刘力云又说：到2010年，中国1164所地方普通高校有债务2634亿元。实际上直属重点高校的债务虽未公布，数字可能更为可观。

也许看到这高教花钱不少，债台高筑，效益不高，更重要的是在亚洲还排不上名次，在“第一”病的刺激下，当局当然也极想在高等教育上来个“世界第一”给世人看看。估计是在这种想法下批准了南科大的设立。及至朱清时校长提出了“教授办校”、“去官化，去行政化”，当局就又含糊了。“党的领导”这个命根子绝对不能放弃，尤其是人大委员长前不久再再声明的“不搞”也作了强调。这三年漫长的犹豫，不给招生许可证的原由大概就在这里。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经担任过中国科技大校长，是一位真正埋头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听说为了保证学生质量，抵制浮夸风，还抵制过上级要该校扩大招生的跃进举措。但是，在当今贪污腐化，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工作的目的只为拿“政绩”换“官位”和“钞票”的大环境，他能为国家真正培养人才而思考，忘我地工作，实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依我看，虽然他心中想的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悦乎？”然而政治重于教学，他一提高校教育的真正问题——“教授治校”、“去官化，去行政化”，那就戳到了某些人的命根子。说什么也不能影响到其“作官”和“领导”的根本利益。所以，这位校长的一片好心、理想、为了中国教育前途的努力，最终还得服从“党的领导”。在有些人眼里，就是不能叫你们脱离“我的领导”，你想不要我“领导”，等于就是不叫我当官，分明是要剥夺我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要想自己干好教育事业？绝对是很难，很难，非常难

除了“走资派”，什么“帽子”都戴过

——画家江友樵印象

它 山

五十多年前沿袭苏联文化建制，在重庆城内夫子池大众游艺园右边（即今解放碑 402 路公交车起点站）路口的文化俱乐部原址上，建立了重庆市群众艺术馆。随即举办重庆市第一次国画比赛，以市文化局名义主办，由馆里美术组谭遥、江晋林负责筹办。我作为分管科室人员奉派参与了此事。

参赛作品不少，花鸟、人物、山水等门类齐全，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江友樵的山水画，水墨淋漓，晓雾夕岚，江波浩淼，情深意远。但是他的画落选了，美术教师文启亨先生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山水画颇受青睐。

在那时国画是被误解的，甚至是受歧视的，总以“像”与“不像”的西画眼光来审视国画中物象的准确性，好比西医认为中医“望、闻、问、切”是不科学的迷信安慰，根本不是医术一样，认为国画以意为之的笔墨造型是不科学的，不是艺术。以科学性来审定艺术性，以山水画脱离现实生活、不食人间烟火为由加以否定。

那时的我才疏学浅，对那些评议更无置喙余地，只凭直觉感到江的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美感，事后多方打听找到鲁祖庙街口左手边江友樵的住家，迳直造访。此君傲气实足，颇费周折，几番考问质疑后方肯开口，但话匣子一经打开又只有他说的没有我说的了。

从四川大学余雪曼主持的美术研究会推选他当主席，又有齐白石推荐他到北京中央美院研究所说起，谈他反对江丰把美院国画系改名为彩墨画系，以及遭冷遇叫他去跟李苦禅一起给学生放幻灯。他大讲中国画以笔墨点划为主，随类赋彩而已，国画的精神结构全在笔墨骨架之中。但在以西画素描为一切绘画的基础的教学环境里，他感到格格不入，甚至达到了相互不可容忍的地步。院方叫他退职回家，他便欣然接受，领了退职费，即赴名山大川纵游饱览，搜尽奇峰打草稿去了。

后在老母催促下才回到重庆家中，参与重庆美术公司组织的出口商品竹帘画，每作一幅有五分至一角钱报酬。当时有很多闲散国画家都以此为生，包括有单位工作的人也喜欢到这里找点“外水”。画竹帘浓墨重彩，要反覆涂抹，力求画上去，根本无法追求笔墨韵味及点划的力度节奏。他明知如此糟塌圣贤，为了生活也不得不屈就。这与他他对国画的抱负与追求向往背道而驰，同时他仍在坚持临习一些明清山水画，用夹江纸习字，吟诗作对，有待时来运转，再展宏图之志。

他出示的十六岁时临清代四王山水的册页，令人吃惊。其笔墨老道，浓淡干湿，节律有序，真是少年气概，势不可挡。而令我更为佩服的，他谈国画的根本是书法，书画同源。这在当时“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以画得像的幼稚观念下，是不易理解和接受的。而且他强调学国画必须从临摹古人开始，这是他固执的观点，也导致他命运蹇促不达。当然，坚守传统精神或随潮流应变，从艺术长远发展而言至少今天还不能定论孰是孰非。但他也决非食古不化，一概排外的遗老。他饱读古文观止熟悉诗词歌赋外，其英语功夫也不一般，当着我，抑扬铿锵完整背诵了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届总统的演说辞。对鲁迅、徐志摩、郭沫若等也并不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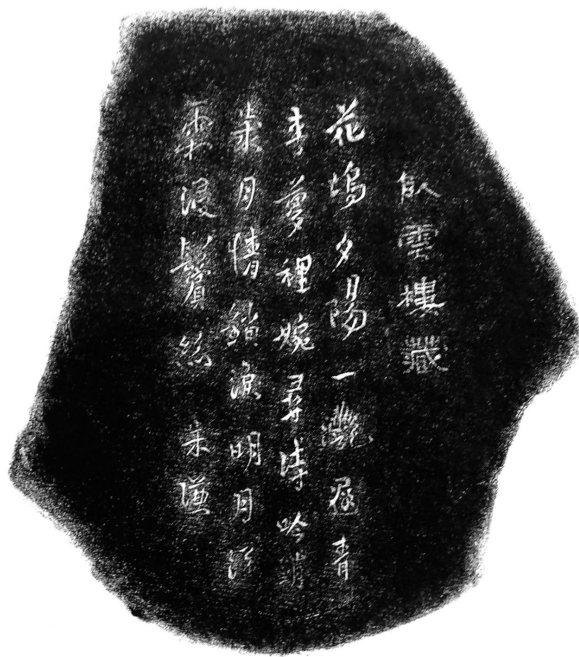
不久，1957 年鸣放整风，他积极主动，或可说是闻风而动找上门，去牛角沱省美协鸣放，不外乎说了些国画与他自己的遭遇。反右时，美协在编的好几位被划为右派，至于外单位的，如谭遥在美协座谈会上鸣放后，则被迫交到文化局划上右派，但是江友樵没有供职单位，就把问题转交到街道办事处，再交给地段上，由那些妇女婆婆组成的群众专政大军监督管制。尽管那些人搞不清啥是右派，但认为反正他有问题，就把他跟他们常年管制的地、富、反、坏一样看待。随着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到来，他都是被抓出来批斗的对象，给地段上提供了搞阶级斗争不可或缺的活教材。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亲朋故旧早已避而远之，只有孤儿寡母二人相依为命，凄凄苦苦住在父辈留下的旧居里，几乎无人敢上门往来。只有那时各单位不断制造出来的各类分子，常常集中到一处批斗示众，被所谓的群众强迫低头批斗时，他们睥睨相视暗暗交换着痛苦与无奈的眼神。“同是

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在多次被斗之中，他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无不感叹地说这些朋友是护着他在那荒诞岁月的大风大浪里泅到岸边苟全性命的恩人，除了生活上时有点滴周济外，还帮助他明白那些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和阴阳怪气的政治术语名词，指点他怎样趋利避害不吃眼前亏等等。

他本是专心绘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新社会毫无威胁的一介书生，而且不谙世事，甚至是个还弄不清那些政治高帽子是什么意义的人，却把他当作随时可能兴风作浪危险的阶级敌人斗来斗去。可笑的是十多年里，他不明不白地戴过右派分子、三反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帽子。他推一下鼻梁上沉重的眼镜架，歉歉然地说道：哎，只有当权的走资派帽子我没有戴过。还幽默地补充出阿Q被追问同党时说的那一句话：“他们没有来叫我。”是地段上没有叫他还是走资派没有喊他？只得会心一笑。反正在每次运动中要抓什么敌人他就是什么敌人。

新结识的难友中有朱谦、李兰、胡越、邓朝宗和歌剧团的小提琴手冯叔容等，一群由中共宣传部门分管的文艺、卫生系统反右之后“补火”才揪出来的种种分子。朱谦是重庆医学院学生，以我国应当是法治国家的言论，被划为极右派学生送去劳教。摘帽后遣散回家，还是要受地段上管制。他们常常会聚在磁器街朱的家里互诉衷肠，相濡以沫。大多是学医、学美术、搞音乐的，对传统文化又有点兴趣的知识人，时常凭借诗词吟咏，借酒浇愁，聊以自慰罢了。他与朱的情谊甚笃，曾将家藏歙砚一方赠予。朱是学医的，对古典文学也颇有功底，在校时组织过诗社。即撰诗一首，自书亲为刻于砚石后。其诗曰：“花坞夕阳一滢迟，青春梦里婉寻诗；吟销岁月情锁泪，明月流霜浸鬓丝。”后来终因不堪忍受在另册的苦难与无休无止的磨折批斗，朱谦早于几位同场被斗的难友，悲愤弃世自杀结束了年青的生命。江友樵哽咽地讲到这里，摘下镜片厚重深凹的眼镜，用一只脏兮兮干枯的手背揩拭着迷糊不清湿润的眼睛。



他究竟犯了什么法，有什么罪？受这样的惩罚与批斗呢？直至1980年，曾经在一起座谈鸣放的汪子美、吕琳、岑学恭、高龙生、杨鸿坤、宋克君、谭遥等美术界的右派，都已先后按中央文件“改正”了。但是找不出江友樵被划为右派的依据和罪证，无证可改，枉在另册22年受尽磨折，还找不到衙门去诉求，问到地段上，只说那是搞运动嘛，“群众”说你是啥子就是啥子。

在“运动”不断的日子里，堵死了江友樵以画画写字维持生计的来源，也剥夺了他教人画画的权利。由地段上安排他在煤店里以手工捶制蜂窝煤为生，养活年老的母亲与自己。由于深度近视，在上下天地漆黑一片的煤店里他常常捶打不到点子上，时日久了才能凭感觉完成任务，但是比别人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汗水。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昏天黑地的日子里他完全被糊里糊涂推来搡去，莫名其妙地被弄在街边地头批斗。他视力极差，双眼迷糊，有人看他那样子以为是在打瞌睡，使用水壶从头顶上淋水，要他打起精神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更有恶作剧者，把辣椒粉投入壶中。他不断揉拭双眼，加重了辣椒的刺激，以致对他的视力带来更大损伤，几近失明。此后他在书画作品上便落款自署“瞎画师”，或自称“瞽翁”。

在相识 23 年后，我再次造访他家。互道沧桑，惺惺相惜，亦如当年一样，他说得最多。我这才知道他这段屈辱的遭遇。临别时，他取下挂在墙上笔墨犹湿的山水画挚意赠予，并当即题诗：

知是南峰是北峰，断虹飞处玉淙淙；
吾斋也欠瀑千尺，赖有藏云一岭松。

题诗后附记：“维亮弟过访小斋论画见许此帧即以奉赠友樵”。其画境意蕴，恰如他淡然叙述那段生活遭遇时，不急不慢娓娓道来，而他傲视风云的内心里却有阵阵松涛。我是刚刚流放归来，故友盛情难却，深受感动地恭敬收下，收藏至今。

当市文联殷白邀约商量成立书法学会之事，许多人余悸未消，顾虑重重。而江友樵甚为欣喜，对书法艺术的继承恢复态度坚决，毫无犹豫迟疑。积极联系书界人士，为后来重庆书法家协会的建立做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工作。从此他临池不辍，日课不绝。

可幸的是，他年近花甲，才与一位女士喜结良缘，相亲相爱，几乎寸步不离，过上了一段幸福的日子。然而不幸的是，不久夫妻结伴去北碚探访亲友，手挽手信步于公路上，突然一声开山炮响，横飞一块片石砸在他夫人的头上，当即血淋淋地死在他的怀里。老天无眼，情何以堪！



后经朋友举荐，在当时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孟广涵过问下，江友樵被安排到文史馆任馆员，有了工资，有了住房，与老母生活在一起，总算命运再次眷顾，得以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他也十分振奋，想在书画艺术上有所作为。我便顺势鼓动他几句，莫负少年壮志，为中国画在继承传统笔墨精华之上拓展新图。他低下头来指着皮泡脸肿的双眼喟叹不已，大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之憾。

40

由于视力下降，所以他更着力于书法创作。这时他的书法面貌很有变化，早年他临习赵字甚勤，规范雅正，但无宛丽之姿。这与其在艰难困苦中抗争的个性磨砺

有关，耿介孤傲而锋芒毕露，铁画如戟，气势雄强。或许由于他的视力衰退仅凭感觉在写字，又生怕落墨不上纸，力求力透纸背所致。

他积极热心地参与市书协的活动，2000 年市书协出版的重庆市书法家作品集，在解放碑新华书店由几位老书家签名售书，他位列其中。不幸的是当天回到家中便病倒了，第二天书协工作人员到他家才发现，他母子二人都瘫在床上不能起来开门。

随即住院治疗，但久病不愈。医药费报销有困难，或是考虑费用低的原因，转到金紫山精神病医院住下，当我去看他时，他抱着少年时那本山水册页泪流满面，饱含壮志难酬的辛酸与悲凉，我俩长久地相对无言。

后来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就死在精神病院。叹其生不逢时，才命相负。冥冥中的命运为何如此诡谲无情，对一个才华崭露而矢志不渝的探求者进行了无情的捉弄。究竟是他还是命运在发疯啊！

2011 年清明

北大形象

杜光

2月23日 收到俞梅荪报道北京大学2月19日老校友新春联谊会的文章，其中谈到：他在给一些右派难友拍照时，有一位校友会工作人员过来干涉，叫他不要照，并且对他说：“上次有人照相上网，败坏了北大形象，我们是北大人，要维护北大形象。”她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北大人要维护北大形象。

北大人要维护北大形象，这当然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命题。问题在于：我们要维护的是什么样的北大形象？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堡垒，有着值得所有北大人自豪的科学、民主和兼容并包的自由传统，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无愧于北大人称号的有用人才。这是北大形象吗？当然是。这样的北大形象，当然值得维护。

可惜，几十年来，这个北大形象却越来越黯淡，代之而兴的是另一种北大形象。长期的党化教育和熏染，消磨了北大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就改变了北大的形象。北大已不再是科学民主的堡垒、学术自由的圣地；相反，却日益官僚化、政治化、衙门化、学店化，崇权尚钱，争名夺利，这样的北大形象还值得维护吗？

可见，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北大形象，一个是光辉的形象，一个是丑陋的形象。一切有良知有自尊心的北大人，都应该维护科学民主的北大形象，鄙弃那个官僚化、专制化的北大形象。听说不久前有几个学生得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面露喜色，竟被取消奖学金的资格，这是专制化的北大形象的最好解读（也是对科学民主的北大形象的破坏）。

41

当然，所有北大人都有责任改变北大的丑陋形象，重塑北大的辉煌。而最有义务、也最有条件重塑北大形象的，应当是目前的校长书记们。别的不说，五六十年以来，北大积累了多少冤假错案，这些都是历届北大领导人造下的罪孽。你们既然继承了他们的职位和权力，当然也有责任解决他们遗留下来的问题。

这几年的校友新春联谊会，每年都有好几位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学生前来，向校长书记们提出道歉赔偿的要求。这是送上门的好事，它不是与你们为难，不是破坏北大形象，而是为你们改变北大形象提供了机会。有远见的领导人应抓住这个机会，表现出北大领导人应有的智慧和勇气，挺身而出，而不应躲避。

对右派索赔，可以有三种选择：下策是借口与我无关，或者党中央没有统一部署，推脱逃避；中策是表示道歉，这是不难做到的，如果说，全国有那么几个右派没有改正，官方还可以辩解的话，那么，北大全部右派都已改正，不就说明北大反右是百分之百搞错了吗？既然完全错了，道歉就是合情合理的。

上策是既道歉，又赔偿。今天的北大完全有这个经济实力，问题是北大领导人有没有这样的胆识。毫无问题，如能采取上策，北大形象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如果顾虑重重，不敢采取上策，那么，采取中策，正式向被划为右派的难友道歉，也多少能改善北大形象；不幸得很，现领导人选择的恰恰是下策。

一九五七年的“在劫难逃”

郭罗基

（摘自《浴火重生的周扬》第六节）

理论务虚会期间，周扬透露了一九五七年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些重要情节。

当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但主持会议，带头发言，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弄错了，不是追悼会。后来了解，是中组部举行的一个仪式，宣布为冯雪峰的右派问题改正，恢复党籍。追悼会是在这之后举行的。）他一见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痛哭流涕。

一九七五年，周扬刚从牢里放出来，独自一人，坐公交车从西到东、横跨北京城去看癌症晚期的冯雪峰。看到雪峰穷困潦倒，周扬返回家中，向夫人苏灵扬要了三百元钱，再次送去。雪峰十分感动，写了一篇寓言《两只锦鸡》，说：两只锦鸡各自拔出一根最美丽的羽毛，送给对方。雪峰行将就木，唯念党籍尚未恢复。周扬连夜给毛主席写信，代诉衷情。而这时他本人的党籍也尚未恢复。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42

冯雪峰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是“在劫难逃”。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宣布：冯雪峰是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第二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上级文化部的通知：“你处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本没有上报冯雪峰的材料，而是四个月以后补报的。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倒并没有把责任都推给这个名单，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陆定一曾自责：“中宣部的任务无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这个，明天整那个。”

以前只知道凑“指标”、按“百分比”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实实在在的预定的“名单”抓右派！而且，没有材料就翻老账。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规模的翻老账运动。

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四人帮”时，江青果然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名单上的人，大多是文艺界的名人，打成右派，往往令人吃惊，所以隔三差五便有轰动效应。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是怨言声声、怒气冲冲。周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大声呼喊，为平反冤、假、错案也出力甚多。但当年的“右派分子”对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七十年代，“右派”丁玲等人变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胡风分子”贾植芳有言：“如果丁玲、陈企霞当权，可能比周扬还周扬。”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

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决定

(1958年1月26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通过)

七个月来,本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盟内出现的右派分子及其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经盟内盟外群众的揭发批判,本盟中央委员会内共查出右派分子59名,其中中央委员40名(包括副主席两名,中央常务委员11名),候补中央委员19名。他们利用了本盟组织和他们的政治地位,进行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从斗争中所揭露的右派分子的罪行充分说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在右派路线的统治或者影响之下,本盟若干地方组织吸收了一批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扩大了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组织基础。为了实现本盟的根本改造,我们对右派路线必须彻底清算,对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必须严肃处理。

为了严肃处理盟内右派分子,本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对本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所提出的对于59名中央一级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座谈会所通过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作出对于59名中央一级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如下:

(1) 右派分子章伯钧

撤销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降职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2) 右派分子罗隆基

撤销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3) 右派分子叶笃义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降职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4) 右派分子沈志远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保留上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5) 右派分子马哲民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保留湖北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6) 右派分子郭翹然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保留广东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7) 右派分子曾昭抡

-
-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高教研究委员会主任。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北京市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安排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 (8) 右派分子费孝通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 (9) 右派分子黄药眠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 (10) 右派分子潘大逵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保留四川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常务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 (11) 右派分子潘光旦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北京市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 (12) 右派分子钱端升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保留北京市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 (13) 右派分子韩兆鹗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保留陕西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 (14) 右派分子王国松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 (15) 右派分子王毅斋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河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保留河南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 (16) 右派分子刘王立明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降职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 (17) 右派分子朱裕璧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 (18) 右派分子何公敢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福建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保留福建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降职、降级、降薪。

(19) 右派分子吴景超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20) 右派分子宋云彬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21) 右派分子李士豪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浙江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降职、降级、降薪。

建议由农工民主党考虑安排。

(22) 右派分子李子健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保留陕西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23) 右派分子李伯球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降职、降级、降薪。

建议由农工民主党考虑安排。

(24) 右派分子罗忠信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四川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保留四川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常务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25) 右派分子陈仁炳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盟内原有职务。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26) 右派分子陈敏之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江苏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保留江苏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27) 右派分子陈新民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湖南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委员、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28) 右派分子姜震中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浙江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杭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29) 右派分子范朴斋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及盟内其他原有职务，留盟察看。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留用察看。

(30) 右派分子张云川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副秘书长。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建议由农工民主党考虑安排。

(31) 右派分子张志和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及盟内其他原有职务，留盟察看。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留用察看。

(32) 右派分子许德瑗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江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保留江西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33) 右派分子彭文应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地方盟内原有职务，留盟察看。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34) 右派分子曾庶凡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四川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常务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35) 右派分子费振东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降职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36) 右派分子黄琪翔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降职、降级、降薪。

建议由农工民主党考虑安排。

(37) 右派分子杨子恒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保留甘肃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38) 右派分子杨希尧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青海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安排下届青海省委员会候补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青海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39) 右派分子钱伟长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40) 右派分子鲜英

-
-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四川省委员会委员。
-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 (41) 右派分子王文光
-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山西省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太原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安排下届山西省委员会候补委员。
-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山西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 (42) 右派分子丘克辉
-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及盟内原有职务，留盟察看。
-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 (43) 右派分子吴春选
-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及其他原有职务，监督劳动，留盟察看。
- (44) 右派分子李康
-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及地方盟内原有职务，开除盟籍。
- 建议：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 (45) 右派分子李化方
-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盟内原有职务。
-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 (46) 右派分子李则纲
-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盟内原有职务。
-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 (47) 右派分子李健生
-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
-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北京市委员会委员。
-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降职、降级、降薪。
- 建议由农工民主党考虑安排。
- (48) 右派分子杜迈之
-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及地方盟内原有职务，留盟察看。
-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 (49) 右派分子陈仰之
-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青岛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
-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青岛市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 (50) 右派分子陈新桂
-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及其他原有职务，监督劳动，留盟察看。
- (51) 右派分子徐雪尘
-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盟内原有职务。
-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52) 右派分子浦熙修

撤销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保留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北京市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53) 右派分子张纪域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具体处理建议由原工作单位考虑。

(54) 右派分子张广标

免予处分。

(55) 右派分子梁若尘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广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保留广州市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56) 右派分子章振乾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具体处理由本盟地方组织及其原工作单位考虑。

(57) 右派分子陶大镛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保留北京市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委员、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58) 右派分子陆钦墀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盟内原有职务。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59) 右派分子舒军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及地方盟内原有职务，留盟察看。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原载宋永毅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 1957——》，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

资料来源：《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专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编印，1958年1月。

来函照登：最近读到一篇写当年重庆长寿湖渔场“右派”难友遭遇的文章中，提到宁振笃之死，说当时宁振笃所在的飞龙队的“组长是摘帽右派黄×、孙×”，“队长和组长组织了对宁振笃的猛烈的批斗”……经我们反复回忆，这两处记叙和事实不符，在文章所述的那个时段，黄×和孙×还不是组长；宁振笃自杀前，队里也没有开对他的批斗会，只是队长公开点名要求宁振笃写检讨和交代。对此，我们已向原作者说明，原作者也表示一定要更正。

原长寿湖飞龙队的一些难友 2011年11月24日